

临沂城市名片

LINYICHENGSHIMINGPIAN

- ① 全国文明城市
- ② 全国双拥模范城市
- ③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 ④ 全国红色旅游重点城市
- ⑤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
- ⑥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
- ⑦ 中国市场名城
- ⑧ 中国地热城
- ⑨ 中国书法名城
- ⑩ 国家园林城市
- ⑪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 ⑫ 国家卫生城市
- ⑬ 国家森林公园城市
- ⑭ 东夷文化发祥地
- ⑮ 战争年代华东暨山东解放区首府



2017·04, 2

主 办：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编委主任：常红军
编委副主任：周俊献 刘志强
编委委员：段 洪 唐少清 于 芹
 王卫东 王友存 朱洪厂
 祁桂菊 朱文江 陈永亮
 高仲平 刘相尚 巩祥军
 刘 露 公 鑫 张玉杰
 崔 平 杨晓莉 肖功江
 徐田宁 杜 帅 徐希冕
 张艳华
主 编：刘志强
副 主 编：段 洪 曲文军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执行主编：呼国英
责任编辑：杜 帅 宋希芝
美术编辑：胡拙安
法律顾问：山东今海瑞律师事务所 刘海亮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1310012号

目 录

【本期特载】

毛泽东与山东战场 茅永怀 曹 骅 茅运云 04

【峥嵘岁月】

成延胜：在符政委身边工作的日子 苏士舰 10
回忆“六九”突围 张如皋 口述 张如浩 执笔 13
铁军大帐追歌行（七）
——新四军军部寻访 刘凤才 16

【名人素描】

林浩：从一介书生到开国少将 夏明星 23
北魏宰相王肃一家 谢燕颀 29

【文化掇英】

舒祥与《沂州志》 丁富强 34
丹青为人民，笔墨随时代（六）
——记著名画家皮之先 刘瑞轩 41

【史海撷萃】

父亲穆林主动请缨下派临沂 曾经并不遥远 45
民主人士邵立均力推“两孩化”国策 宋继民 49

【蒙山沂水】

明代泾王与费县王林 二月春风 51

【探索发现】

臧西山和他的民兵模范队 高 雷 55

【古城旧事】

记忆中的老建筑——关帝庙 本 编 61

【诗画赏析】

民国时期的临沂画坛 大荒堂主 62

【史料辑存】

八路军一二九师津浦支队始末及后续发展(上)
泰宁军 65

【文史论坛】

从历史深处回望故乡
——读王兆军近作《春秋故城祝丘》 钱勤来 王韵然 67

【影像沂蒙】

解放战争时期的临沂飞机场 本 编 69

【百家渊流】

姓氏百家漫谈——朱姓(五) 赵丹峰 71

【文明之星】

青春无悔
——追记我驻索马里使馆警卫人员、武警战士张楠
张东波 刘 新 关晓虎 73

【沂蒙名医】

“相傅”之救危之星(下)
——记宋文采 刘凤才 77

【史志动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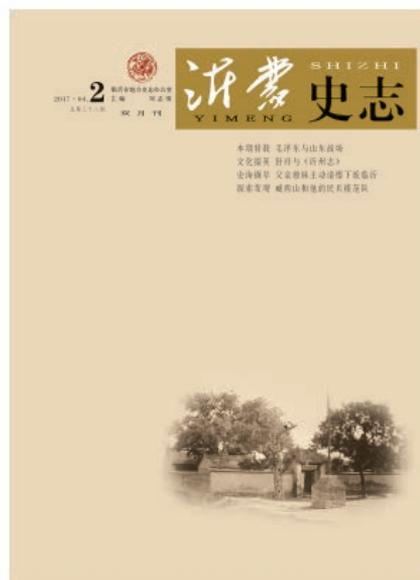
80

封面：关帝庙

(详见本期《记忆中的老建筑——关帝庙》)

封底：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临沂出土之《孙子兵法·九变》 胡石/书



地 址：临沂市北京路17号
行政服务中心655室

邮 编：276000

电 话：0539-8727562

邮 箱：yimengshizhi@163.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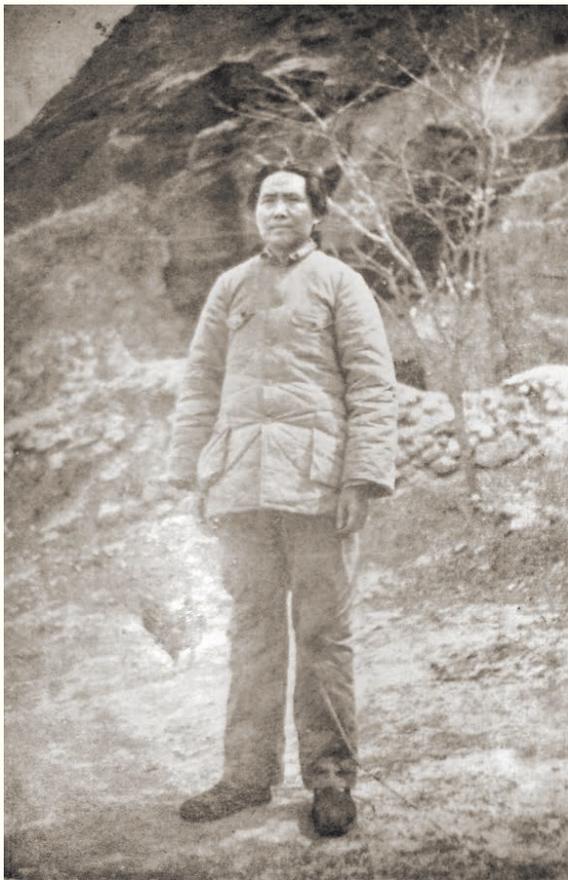
网 址：<http://www.linyisq.gov.cn>

《沂蒙史志》栏目

印 刷：济南黄氏印务有限公司

毛泽东与山东战场

茅永怀 曹 骅 茅运运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战场开始从中国的革命舞台上崛起，并以其日益突出的地位和能量影响着全国的战争态势，决定着中央的战略布局。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山东从一个敌后沦陷区迅速发展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全省性的革命根据地，创造了中国革命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毛泽东高度重视山东的革命和解放事业，总是把山东战场放在全国革命的大局中去思考、谋划，周密部署，精心指导，为山东军民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倾注了大量心血。

一、高度重视，调兵遣将，布局山东抗日战场

1935年，日军直逼华北，民族矛盾急剧上升。面对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经过长征刚到达陕北的毛泽东，在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1936年8月，他致信东北军将领、当时主政河北省的宋哲元：“鲁韩（复榘）绥傅（作义）晋阎（锡山）三处，弟等甚愿与之发生关系，共组北方联合战线。”毛泽东的战略目光开始从西北转向齐鲁大地。

1937年春，毛泽东到招待所看望到延安参加党的代表会议的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指示：“山东是有基础的。当前一定要搞好统战工作，为今后的发展创造条件。”

7月，全国抗战爆发，毛泽东提出开展以游击战争为主的抗日战略方针。9月，八路军3个师由集中配置改为分散配置，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毛泽东要求发动全华北的中共党员，动员民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而有计划地组成游击队。在电报中，毛泽东特地点明“包括山东在内”。就在这个月，中央派出一批红军干部秘密到达济南，经省委分配到各地，参加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

在日军主力南下时，毛泽东判断日军转向华北“这一步骤的到来将在稍后”。目前日军进攻的目标是徐州，下一步还会再向南，因此“华北游击战争还是广泛开展的有利时机”，决定利用日军主力南下与国民党军展开激战的这个空档，果断作出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的重大决策。12月，毛泽东致电朱德，提出到平汉铁路以东的平原地区进行试探性的游击作战。随后，毛泽东先后派遣干部前往冀东及冀鲁边区，开辟新的游击试验区。

毛泽东对山东战场的重视与关注给予了中共山东省委极大鼓舞。经过精心部署，山东各地党组织抓住时机，发动了遍布全省的武装起义。

1938年4月5日，毛泽东在延安听取黎玉关于山东情况的汇报，非常高兴，连声说：“好，好。你们能抓住时机，建立起自己的武装，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要求中共山东省委进一步公开大胆地发展抗日武装斗争。黎玉请求派一个主力团到山东，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并认为：“一个团是不够的。看来还要多去一些。”当日，他还致电时驻武汉的周恩来：“山东书记黎玉那边游击战争大可发展，鲁南第四支队三个月内由70人发展至1200人、800枪。”5月6日，毛泽东又特别指示中共中央长江局：“山东游击战争战略上意义重大，决以张经武同志去山东。”他充分肯定了山东的抗日武装起义，还在延安的一次高干会上高度赞扬中共山东省委所做的工作。

6月，中共山东省委坚决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召开干部会议，讨论发展和坚持游击战争的战略规划，并报请党中央批准。毛泽东在复电中表示，完全同意中共山东省委所制订的战略计划，希望按这个战略计划去实施。从此，山东开始了有计划地全面创建根据地的新阶段。

当时，起义武装在山东大地风起云涌，各抗日武装名称不一。毛泽东敏锐地看到，这种不统一对发展极为不利。于是，他于6月6日电示：“山东的基干武装应组建支队，恢复使用八路军游击支队番号，目前可组成四至五个支队，县区武装则以支队领导下的游击队名义出现，用抗日联军名义不好。”此电报发出后，仍感不放心，8日又发一电，强调：“凡属我党领导，已取得广大群众拥护，又邻近友党友军之游击队，以用八路军名义为宜。”

根据徐州失守后的形势，中共中央决定重组中共山东省委。数日后，又决定将中共山东省委扩大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8月，根据毛泽东“派一批军政干部到山东工作”的指示，八路军鲁东游击纵队指挥部在延安组建，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委，这是八路军山东纵队领导机关的前身。

张经武、黎玉率领的这个精干的纵队领导机关，于11月中旬抵达鲁中。12月27日，在鲁东游击纵队领导机关的基础上，山东纵队（简称山纵）在沂水县西部的王庄宣告成立，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委。所属部队整编为10个支队，另3个团，共25个团、24500人，还有地方武装1万余人。山纵的创立，标志着山东人民起义武装已由若干分散的游击队成为在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对此，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给徐向前、朱瑞、黎玉的电报中这样说道：“山东工作在同志们艰苦创造

中，已获得巨大的成绩，没有八路军和没有足够数量的具有军队经验的干部帮助条件下，地方党已经单独创造出较有战斗力走向正规化的军队，它将成为坚持山东抗战的主力军。”

此时，根据形势的变化，党中央决定改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郭洪涛仍为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建立起沂蒙山区、清河区、胶东蓬黄掖地区等3块抗日根据地以及鲁南、湖西、泰西、鲁东南等若干块抗日游击根据地。到1939年底，山纵共作战2000余次，毙伤日、伪军4.1万余人，收复城镇20座。山东八路军（含冀鲁边区和鲁西北地区）已达近6万人，党员总数达1万余人。

二、建立政权，发展武装，打造稳定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一切军事斗争的目的在于政治，政权则是政治的集中表现形式。早在1939年5月，毛泽东、党中央即指示山东“在政权问题上，应认识无论八路军部队或地方游击队，如无政权则决不能发展巩固与建立根据地，因此已得的政权决不应放弃，并还应努力争取新的县政权”。11月，又进一步明确要求“必须进一步依靠群众，必须深入群众工作”，才能“争取继续抗日，争取民主政治”，“否则是不可能的”。因此“认真的研究群众生活，群众情绪，群众要求，根据上述方针，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具体口号之下，一步一步的组织他们，教育他们，领导他们改良生活，发动他们的积极性”。

抗战初期，山东党组织手中既没有几支枪，也没有一个村级政权，更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可以依靠，党在社会上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力。山东党组织遵照党中央、毛泽东的上述指示精神，依靠群众，为了群众，发动群众，开始在县、区、乡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并将政权逐步改造为真正代表群众利益、行使人民民主权利的政治工具。到1940年夏，正式建立了基本以一省的行政区划为主体的山东抗日根据地。至年底，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发展到7.6万人，山东纵队发展到5.4万人；行使政府职能的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正常运转，还成立了两个行政主任公署、10个专员公署和79个县政府，党员发展到11万多人。

为进一步发展山东抗战，毛泽东多次提出派主力部队去山东。

早在1938年2月25日，毛泽东在给朱德、彭德怀的电报中就提出“用一一五师全部向东出动……转入山东境内，在津浦山东全境作战，并以鲁南山区为根据地”。当黎玉向毛泽东要求派一个团的主力到山东时，毛泽东说：“看来还要多一些。”这年9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明确提出“派兵去山东”。12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六八五团即到达山东湖西地区。翌年3月1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和第六八六团在陈光、罗荣桓率领下进入山东。在此前后，八路军其他主力部队为发展山东的抗日游击战争也相继到达山东，极大地增强了山东的抗战力量。

此后，毛泽东又多次就山东的军事工作、根据地创建、政权建设、党的建设作出指示。他在《对山东的军事工作的意见》电报中指示：“要努力扩大山东纵队，努力整训工作，以求迅速地正规化……建立正规的供给制度，胶东银行可发行纸币，兑换成其他的纸币供给鲁南及其他地区之用。在取得政权后发行流通券及收粮、收税，以便有解决军队给养的长远计划。健全政治机关的工作……明确军队的组织原则，一切最重要的干部，应当由党员充当。提高党支部及党员作用，支部……应当成为连队的坚强堡垒。”

1940年1月28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一一五师的电报中指示要“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山东分局与一一五师至少应

发展武装军队（包括游击队）到15万人枪。要建立这样大的武装力量，没有政权是不行的。因此必须以坚决与逐步的计划，极力争取山东……大部政权归入我们与进步人士的手中”。强调“集中一切力量为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而斗争乃是你们最主要最主要的任务”。并指示，对国民党军队要采取灵活政策，减少军事摩擦，努力从政治上争取中间派、孤立顽固派，但对“阻碍抗日进步势力发展并向我攻击之反动势力与顽固派，我必须坚决反击之”。

山东党组织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加上第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协同作战，很快打开局面，山东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武装迅速扩大。

在以后抗日战争的艰苦斗争和胜利反攻的岁月里，山东始终与华中南北呼应，相互支援，战略联系稳定，华中与华北及延安的通道畅通，充分发挥了“华中靠山”的作用。

三、运筹帷幄，英明决策，积极组织大歼灭战

抗日战争后期，山东抗日根据地通过连续攻势作战和大反攻，解放了山东绝大部分地区，成为敌后最强大的根据地之一，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以此为基础，山东成为我党我军进军东北的主要出发基地和粉碎国民党向北推进、发动全面内战的战略前沿阵地，同时成为决定今后敌我力量对比、时局转换的关键地区之一，从而为实现我党由抗日战争向全国解放战争的历史转折作出了其他根据地无可替代的突出贡献。

1946年6月底，蒋介石对解放区悍然发动全面进攻，山东成为国民党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的主要地区之一。毛泽东也因此更加关注山东解放区的巩固和战局的发展。

战争初期，敌强我弱。但是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到同年12月，歼灭国民党军34万余人，国民党军则以巨大的人员伤亡为代价占领了解放区的110余座城市。

面对敌人的大举进攻，毛泽东指示山东部队“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实施内线歼敌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山东军民在胶济线和鲁南地区连续取得反击敌人进攻的胜利，仅仅半年时间，华东军民就歼灭国民党军16.6万余人。这些胜利，鼓舞了山东军民的斗志，阻滞了国民党军的进攻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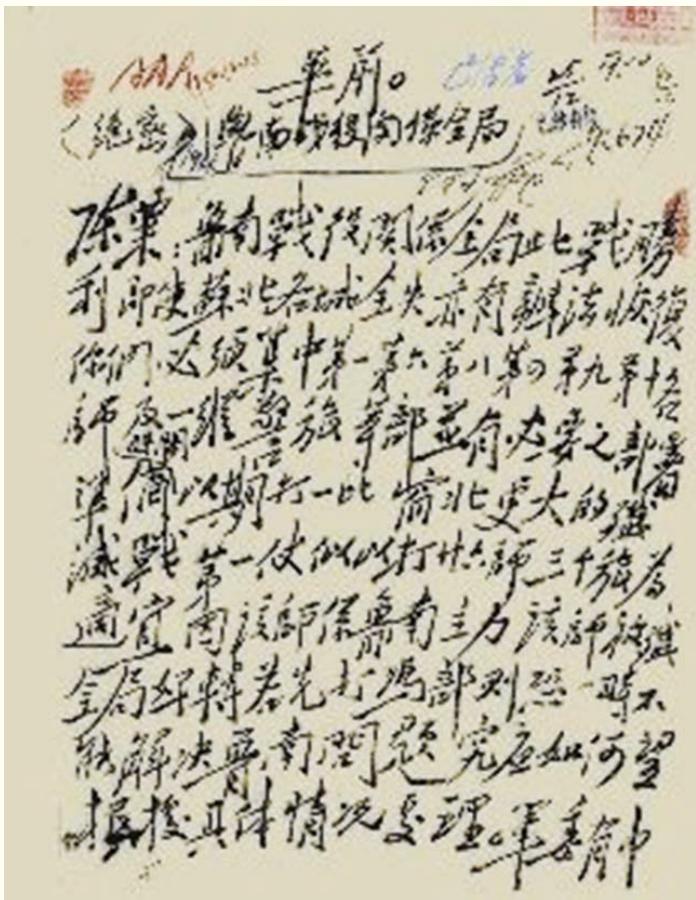
12月，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取得宿北战役的胜利后，毛泽东不失时机地于18日辰时（7—9时）致电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和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在祝贺宿北战役取得胜利的同时，又向他们提出下一步的任务，那就是集中主力进行鲁南战役。毛泽东在电报中要求：“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并相机收复枣（庄）峰（县）台（儿庄），使鲁南获得巩固。”

1947年1月4日，我军取得鲁南战役的胜利，打乱了国民党军会攻临沂的战略计划。

毛泽东认为，改变战局的关键在于争取更多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从全国范围来看，当时主要依靠华东、晋冀鲁豫两大主力的协同作战。因此，他要求山东和华中两个野战军积极寻找战机，打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消灭敌人。

鲁南战役后，华东主战场移向山东。国民党为彻底解除华东野战军（由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并而成）对南京的威胁，同时，企图以军事胜利影响将要召开的涉及中国问题的美英法三国外长会议，遂于1947年1月下旬制订了“鲁南会战”计划，妄图迫使华东野战军在临沂附近与之决战，进而完全占领山东解放区。

对此，毛泽东、中央军委与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谭震林多次就作战方案进行



毛泽东关于鲁南战役给陈毅、粟裕的电报

电报沟通。毛泽东指示，宜在鲁南诱敌深入歼灭战。

华东野战军首长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心放手诱敌北进至临沂外围地区予以各个歼灭，同时做了保卫临沂的准备。

正当南线敌人迟迟不为我华东野战军引诱和调动之际，是“保卫”还是“放弃”临沂就面临最后的抉择。

密切关注鲁中南战场形势的毛泽东，在反复阅读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谭震林等几天内频频发来的战情报告后，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从而为华东野战军最后决定作战方向奠定了有力的依据，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2月4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陈毅、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的电报中明确指出：“敌愈深进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急效，并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目前敌人策略是诱我早日出击，将我扭打消耗后再稳固进占临沂，你们切不可上当……”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华东野战军挥师北上，中共中央华东局也主动撤出临沂。正当敌人为占领临沂、为“临沂大捷”所陶醉时，华东野战军以优势兵力，将国民党军李仙洲部歼灭于莱芜，从而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南北会师侵占整个山东的计划，打乱了国民党进攻山东解放区的部署，为人民解放军进行大规模运动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针对蒋介石继续把战火引向解放区的图谋，毛泽东、党中央又作出了不等完全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和在数量上超过敌军，就立刻转入全国性反攻的重大决策，指示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阳谷渡过黄河，展开鲁西南战役，揭开战略反攻的序幕。同时指示华东野战军迅速确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在外线积极歼敌，全力配合刘邓大军的外线作战。

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华东野战军抓住战机，积极实施外线出击，取得

了沙土集战役的胜利，扭转了外线出击初期的被动局面，从而有力配合了刘（伯承）邓（小平）和陈（赓）谢（富治）大军在中原的展开，积极策应了内线兵团在山东的作战。

1947年8月，国民党军为截断我军的交通线，迅速结束山东战事，以便移兵他用，蒋介石决定以胶东为作战目标，集中兵力，实行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25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就集中兵力于胶东内线作战与集中兵力在胶东外线作战两种方案的利弊报告毛泽东，请毛泽东电示。

当日，毛泽东即致电饶漱石、黎玉，并告陈毅、粟裕、刘伯承、邓小平：“蒋介石似乎判断我主力必守胶东，企图……吸引我主力进入内线后……加以封锁……蒋介石必在胶东方面力求速决，以便抽兵。因此，我们完全同意你们以一部位于内线，以主力（二、七、九纵）位于外线，以利持久之方针。只要许、谭率三个纵队位于外线（诸城一带），寻机打一二个小胜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敌即不敢向胶东深入，胶东大部至少一部即可保全。”

毛泽东的电报一锤定音，此后又多次电示华东野战军和中共中央华东局，果断地决定要东线兵团应以一部位于胶东内线阻击，主力位于外线待机歼敌，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保卫胶东解放区的作战方针得以确立。在毛泽东、中央军委的英明指挥下，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和胶东解放区地方武装在历时5个月的胶东保卫战中，以主力一部和地方武装节节抗击，杀伤进犯的国民党军，主力则避其锋芒，时分时合，创造战机，选择孤立冒进的敌人加以歼击，并结合围点打援，共歼灭国民党军6.3万余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大大改变了山东战场的形势，有力地配合了刘邓、陈粟、陈谢三军开创中原解放区的作战。

从1947年8月至1948年7月，我军取得了一系列战役的胜利，对敌决战态势基本形成。基于战局的发展，毛泽东又将解决攻克大城市难题的战略意图转向山东济南，果断作出了攻打济南的重要决定。

为打好济南战役，毛泽东亲自审定作战方案，前后共发出近20封电报，从战略运筹到战役部署的方方面面完成了对济南战役的基本决策，明确要求集中优势兵力攻济打援。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电示，在参战部队纵队以上领导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一致认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提出的作战原则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就在部队即将攻城时，即9月22日早晨，毛泽东又给华东野战军首长和中共中央华东局发去一封短电，要求布置多层堵击力量，防止王耀武率其死党突围出逃。

事态的发展果然未出毛泽东所料，济南城被攻克后，王耀武从设在大明湖北岸地下室临时指挥部的暗道中化装潜逃。由于华东野战军和中共中央华东局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事先部署民兵、公安干警和群众实行联防警戒，“节节堵击”，王耀武终在寿光被抓获。

济南战役从9月16日我军发起全线攻击，到24日攻克济南城，前后不到10天，而攻城作战仅用了2天。正应了毛泽东提出的“争取10天内外夺取济南”的设想。

在指挥山东我军对敌作战的同时，毛泽东还对山东各项工作给予了许多指示。在毛泽东的关怀下，山东党组织顺利完成了土改、生产、支前、救灾和各项建设任务，使山东解放区成为华东战场人力、物力、兵力的重要基地，成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巩固后方，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正是由于毛泽东心系山东、胸怀全国、放眼世界，对山东战场的态势和发展倾注了无尽的心血和智慧，才使山东战场的胜利为夺取全国军事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成延胜：在符政委身边工作的日子

苏士舰

前年夏天的周末，我与同事来到始建于战火纷飞年代的抗日烈士陵园——马鞍山抗日烈士陵园。这座烈士陵园由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二旅政委符竹庭带领八路军战士和当地群众，为纪念牺牲的烈士们在赣榆班庄小山脉修建的。

符竹庭生于1912年，15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入党，17岁出任红三军第七师一团政委，22岁出任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部主任。他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率领先头部队抢关夺隘，确保了红一军团胜利到达陕北会师。1937年，他出任六八六团政治处主任，率部作为主攻部队，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平型关大战。从1938年10月起，历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鲁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滨海军区政委，与罗荣桓、杨勇、萧华等开辟冀鲁边、鲁西、鲁南和滨海根据地，参与指挥了郟城战役、赣榆战役，取得辉煌战绩。赣榆大捷后一周，符竹庭将军永远地离开了人世，成为陵园安葬



陈士榘、罗荣桓、李天佑、萧华在晋西孝义

的我军最高将领。

时光如水，一晃70年过去了，却无法抚去人们对将军的悠悠思念。英烈们那些曾经让人热血沸腾的言行仍时刻感动着我们。在这里，我有幸见到了健在的符竹庭生前勤务员成延胜。

成延胜老人，赣榆县墩尚镇墩尚村人。他家境贫寒，5岁时，父母失踪，靠外婆抚养。1940年初春，八路军进入该村，年仅15岁的成延胜，出于对八路军的好奇及打日本鬼子的愿望，没有和外婆告别，远走他乡加入了八路军。成延胜人小体弱，长长的步枪背在身上很吃力，年纪大的战士都会主动照顾他，但要行军打仗就难以胜任了。连长便将他送到了教导二旅六团团部，在锄奸股当了一名勤务员。1941年5月的一天，旅政委符竹庭发现成延胜年纪虽小，但人挺机灵，就点名让他做自己的勤务员。符竹庭当时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二旅政委兼滨海区党委书记。一听说符政委要他去做勤务员，成延胜有些紧张，担心服务不好大首长，要挨训。和符政委相处几天后，成延胜就没有受拘束的感觉了。符政委虽然是首长，但对士兵亲如兄弟，没有一点官架子。成延胜在符政委身边，早晨按时起床出操，紧接着清扫院子，整理室内卫生，做好勤务等日常工作，同时参加机关人员的政治和文化学习。

战争是残酷的，经常有同志牺牲。为了使烈士们有一个安身的地方，教导二旅选择在班庄马鞍山（又称抗日山）建立一座抗日陵园。在修建抗日烈士陵园7个多月的日子里，成延胜亲眼目睹了符政委头顶烈日风雨常与军民吃住在施工现场，对战士和施工人员十分关心，工程后期，天气非常炎热，他要求后勤人员多烧茶水保证供应，主意防暑降温工作。由于他亲临现场监工与指导。在边抗日边施工的情况下，1942年7月1日，“抗日山烈士纪念塔”工程终于竣工。

符将军爱兵如子。成延胜老人回忆道，有一次，他去村边小河里将多日未洗的被褥清洗干净时已过了午饭时间，他的午饭已被其他同志吃了。符政委得知后，安排伙房从自己的口粮里烧了碗小米饭给他吃。成延胜老人感恩地说：“他虽然大我13岁，但总拿我当孩子照顾，对我十分关怀。”

在日常生活工作中，符竹庭从不搞特殊化，经常与战士们在一张桌子上吃一锅饭，不管什么时候，对饭菜从不挑剔，煎饼、面糊涂、高粱米饭，样样都吃得香。当时旅首长在伙食上可以享受补助，但他总是按战士标准就餐。晚上工作晚了，经常叫勤务员先休息，自己在煤油灯下工作到深夜。

符竹庭的衣服，穿得时间太长，灰色军装有些“朽”了，成延胜洗时不小心将衣服搓破。他没敢将这件事告诉符政委，心里忐忑不安。符政委看到了洗破的衣服，不但没有批评成延胜，而且耐心地手把手地教他缝补衣服。成延胜多次提到：符政委生活朴素，作风正派，对人和气，是干部和战士的贴心人。

1943年11月19日，符政委率部发动了赣榆战役，全歼赣榆县城守敌，俘虏了伪军2000余人。这一战役，成为我军敌后克城的范例，被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头条登载。1943年11月26日凌晨，天蒙蒙亮，伴着浓浓大雾。驻守在黑林镇东北的马家旦头村旅机关人员听到起床号后，都集合在村东河边的一块空地上跑操，符政委及几位首长，牵着马在村边一边遛马一边谈着工作。这时，从柘汪方向进犯之敌600多名，突然来袭击旅机关驻地，正在遛马的首长们及出操的战士们听到哨兵的枪响立即赶回村里。成延胜急忙跑回住处，整理了文件包及背包等行李后交给马夫先转移。此时，特务连等部分连队战士将日伪军阻击在村外东边的小山丘下，掩护机关后勤人员撤退。符政委率领部队撤离该村时，不慎头部撞到了村土圩大门框上摔下马来。闻讯而来的卫生队用担架迅速将他转送到山东莒南县境内根据地，由于头部伤势严重，加之医疗条件差，他当日就去世了，年仅31岁。滨海军区在抗日山为



一二九师骑兵团政委邓永跃（左二）、与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华（右一）、政治部主任符竹庭（左三）、王振华（右二）在南宫合影

符竹庭将军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为了纪念他，在1945年至1950年间赣榆县曾改名为“竹庭县”。说到此处，年过八旬的成延胜老人不禁热泪盈眶，他动情地为我唱起了当时那流传的民歌《纪念符竹庭》：“竹庭将军家住江西广昌县，他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老乡们呀，他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

符政委去世不久，成延胜留在旅后勤部担任通讯员，直到1950年春，他才复员回到了墩尚村。他一直在家乡默默无闻地生活着，先后担任过村生产队长、党支部书记。这么多年了，他从不向别人提起过去的历史，甚至很少与家人谈起那段军旅生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冲击时也泰然处之。他说：“符政委为抗日把宝贵的生命都献出去了，跟他比，我受的这点苦能算什么呢？”

临别时成老感慨地说：虽然跟随符政委只有两年多，但却是终生难忘，作为一名勤务员从心底怀念着老首长；他的一举一动都给我带来很大的感染力，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回忆“六九”突围

张如皋 口述 张如浩 执笔

70年前发生在兰陵县的鲁南战役在中国解放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就在同一年（1947）同一块土地上发生的“六九”突围战略大转移，同样值得大书特书。这次战略大转移，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粉碎了敌人妄图在山东消灭鲁南党政军机关的阴谋，保存了革命队伍的有生力量，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

1947年5月16日，我华东野战军在孟良崮歼灭国民党王牌军七十四师之后，蒋介石组织36个团共十万多人的武装力量，向沂蒙山区反扑，妄图把鲁南党政军机关消灭在沂蒙山区。6月6日，敌人从四面八方进攻抱犊崮山区根据地。我鲁南区党政军机关人员，鲁南各县撤退出来的干部、家属、民兵共五万余人被困，形势异常严峻。6月7日，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政委付秋涛与鲁南区党委领导同志研究决定，为了保存革命实力，避开敌人的锋芒，作战部队掩护党政军机关干部、民兵、家属一同转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为了分散敌人的注意力，迷惑敌人，突围分两路，一路由鲁南三军分区司令员胡大荣带领，经吴坦、四哨、层山到杨庄；另一路由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政委付秋涛带领，经磨山、耿墩直奔涌泉。每路突围的队伍都是部队战士在两边，党政机关人员、民兵及地方干部家属夹在中间。一个团护送突围人员，另两团断后，阻击追赶的敌人。五万多人的转移队伍，其中有伤病员、年老体弱及地方干部家属。队伍一路急行军，来不及吃饭、休息。饥饿、疲劳，困乏，人们被折磨得精疲力尽。急行军100多里，第二天早上，天气突变，狂风暴雨夹着冰雹劈头盖脸砸了下来。行军队伍没有雨具，

只能冒雨前进。雨越下越大，天也越来越冷，层山南湖是粘土地，“干如狼牙湿如鳔，不干不湿抠不掉”。上面雨淋脚下打滑，几万人走过的路成了稀泥潭，又湿又粘拔不出腿来。好多战士支撑不住，倒在泥浆里。由于困乏饥饿到了极点，人只要蹲下就很难再站起来。在这紧急关头，军区领导召开紧急会议，提出了“坚持就是胜利”的口号，要求发扬阶级友爱精神，照顾好伤病员，扶老携幼，相互搀扶，咬牙坚持。就这样大家互相搀扶，相互鼓励，在风雨中艰难行进。为了减轻身上的负担，战士们扔掉背包，伙夫扔掉锅灶，勤务员扔掉文件箱，把文件揣在怀里，饿了揪把尚未收割的麦穗，搓搓吞到肚里充饥。有的女同志实在走不动了，就七八个人拽着马尾巴，像拔河一样在泥潭中摆来摆去，艰难行走。

一路上泥浆血水混在一起，战士们满脸是泥，分不清面目。倒下的战士越来越多，仅九连就有13名战士牺牲。

我所在的三分区十九团三营，营长王严文是从延安过来的老红军，曾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多次负伤身体虚弱。这次突围他自告奋勇担任南路的保卫工作。他一心想着同志们安全，不顾自己身体虚弱，把马让给患病的通讯员骑，自己拖着虚弱的身躯徒步前进。由于疲劳过度，倒在泥地里光荣牺牲。老司务长也停止了呼吸，炊事员马大爷光荣牺牲。西路临西县县委副书记刘继忠、县委书记刘炬警卫员薛颜贵等同志都一个个陆续倒下了，一路上共有230人牺牲，伤者1000多人。我家在层山东村，当年16岁，在八连当文化干事，在突围中死里逃生。当时我昏倒在泥浆中，大部队过去后，又被雨水激醒，一连爬了三四次都没能站起来，艰难地站起后看到北边三里远处的家乡，就很想回家。可又一想，若回家就赶不上部队了，我怎能掉队呢？就坚持着摇摇晃晃地向杨庄走去，一路上还收容了十几位掉队的同志。后来，被营救的同志一致要求给我记功。我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突围部队五万多人到达涌泉、杨庄等村以后，家家户户像接亲人一样，把亲人接进家，生火，做饭，烘烤衣服，妇女给战士洗衣服，汪边都是洗军衣的姐妹。下雨天没有干柴，乡亲们就抽床上的秫秸，拆薄帐子（用秫秸扎成把排在一起当墙



用），把能吃的都拿出来，能烧的都烧了。苍山县委政府驻在涌泉，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动员全村村民，全力以赴抢救伤员，救死扶伤。每家每户都安排十多个战士吃饭，自己记帐，以后由县委归还。县委还组织青壮年到村外，寻找掉队的伤病员。父老乡亲把伤员背回家，对昏迷不醒的进行全力抢救，用调羹一勺一勺地往嘴里喂饭。有的老妈妈把伤员抱在怀里，用体温暖活，有的妇女把做月子的小米、鸡蛋拿出来供伤员吃，把自己准备的嫁衣给女同志换上……被救活的同志感动得热泪盈眶，说“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根据地的父老乡亲”。

在这次生死大营救中，层山人民舍生忘死抢救伤员，事迹感人，涌泉付大娘（袁明）一人就抢救伤员9人。有的感动得拜她为干娘，把她当作再生母亲。这次突围共抢救伤员1000多人，救活战士300多名。鲁南军区政委付秋涛在涌泉会师大会上抒诗一首，热情地讴歌了层山一带人民对子弟兵的爱：

一九四七年，六月七日晚，冯治安为首，国军十余万。
鲁南陷重围，五万军政干，秋涛临危静，部署总动员。
大军分三路，跳出包围圈，撤至台潍路，天空突然变。
狂风裹冰雹，漫野变泥潭，寒冷饥饿裹，马冷人困倦。
弱者中途倒，伤者盼生还，军干群相助，彼此搀扶挽。
全村齐接应，胜似亲人般，腾房双搭铺，湿衣夜烘干。
献上新棉被，做出可口饭，劳军二万多，救活三百三。
区委总结会，秋涛做发言，突围能成功，多亏咱涌泉。
将来胜利了，这账定要还。

大队人马在层山休整一宿，第二天拂晓渡过沂河。等敌人组织兵力围攻时，队伍已悄悄地到达了滨海革命根据地，胜利完成了这次突围任务，实现了战略大转移。

铁军大帐追歌行 (七)

——新四军军部寻访

刘凤才

江苏盐城——重振新四军

(1941年1月25日——1941年7月10日)

盐城新四军重建军部旧址，位于江苏省盐城市城区内多个地方。今建军西路126号的泰山庙，是当时军部最重要的旧址之一。在今建军东路上还建有新四军纪念馆、重建军部纪念碑等。纪念碑上雄起着一座新四军战士雕塑，持枪跃马，勇往直前，是对当年新四军军部重建、继续带领铁军奋勇前进的最好纪念。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于1月25日在盐城重建军部。军部初设于熊家祠堂，同年2月27日，军部和华中局进驻泰山庙内作为办公地点。泰山庙为4进大殿，前殿为山门门堂，两厢有房屋8间，为司令部警卫人员居住。第二进为军部会议室，殿前为露天会场。第三进为正殿，为新四军司令部作战室，军参谋长赖传珠在此办公，墙上依次悬挂着苏中、苏北、苏南、淮南、淮北、皖江和鄂豫边7块抗日根据地的作战地图；东侧有两部电话、两张行军床，为军部作战参谋值班的地方，西侧是报务人员工作场所。第四进为后殿藏经楼，楼下东、西房为刘少奇和陈毅同志办公与居住地点。刘少奇曾在中间的小会议室主持召开过两次华中局高级干部会议，陈



盐城军部旧址泰山庙

毅也在这里接待过外国友人汉斯·希伯和罗生特。庙的大殿两侧为东、西各3幢厢房，原为中共中央华中局饶漱石、曾山和机要、警卫人员住地。

1941年7月初，日伪军对盐阜地区发动第一次大“扫荡”，新四军军部撤出盐城，两个多月中，先后转战于阜宁县10余处村镇，至9月份，落脚停翅港。泰山庙遭到敌机狂轰滥炸，破坏十分严重。

1985年5月，盐城市政府照原样重建泰山庙，1986年10月建成并对外开放，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8月被江苏省委宣传部公布为江苏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一、涅槃凤凰得再生，重建军部于盐城

皖南事变，全国震惊；新四军上下，义愤填膺。1941年1月15日，就在皖南事变后的第二天，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盐城郊区召开的高级领导干部会议，临时改为声讨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控诉顽固派滔天罪行的大会。刘少奇通报了事件经过，神情凝重肃穆。陈毅率先发言，他义愤难平，怒发冲冠，边说边摘下军帽，一把撕下国民党帽徽，痛骂顽固派，高喊血债要用血来还。全场人员无不悲愤难抑，纷纷表示要为死难战友报仇雪恨。同时，所有人都在密切关注与焦急盼望着新四军军部何时重建。

仅仅过去了10天时间。1941年1月25日下午2时，在盐城老城原大戏院旧址改建的游艺园内，一派隆重热烈、激越向上的景象。会场四处，彩旗招展，迎风飘扬；主席台两侧，“义旗高举”“指挥若定”“拥护新四军”等锦旗和抗战标语口号鳞次栉比。嘹亮的战歌声、高昂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交汇成一片。刚刚搭建起来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一条大大的红色横幅，“新四军军部重建大会”一行大字，醒目地映入人们的眼帘。场内1000多名新四军、八路军指战员和各界代表人士，满怀对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发动皖南事变的强烈义愤，强压着对新四军刚刚遭受巨大损失的满腔悲愤，同时也满怀对党中央迅速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的振奋，在这里举行新四军军部重建大会。

新任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主持大会，首先宣布大会开始，由何士德指挥全场齐唱《新四军军歌》。接着，由刘少奇宣读毛泽东亲笔起草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于1月20日发布的命令。

这时，只见多数人都已认识的中原局书记“胡服”同志，站立到主席台中央，操着浓重高亢的湖南口音，开始宣读命令：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军长叶挺，领导抗战，卓著勋劳。此次奉命北移，突被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迭据该军第一支队长陈毅、参谋长张云逸等电陈皖南事变经过，愤慨之余，殊深軫念。除对亲日派破坏抗日、袭击人民军队、发动内战之滔天罪行，另有处置外。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代军长等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

命令宣读完毕，与会人员都对两件事产生了极大好奇：

其一，指战员们都敏锐地感觉到了一条：我们党在新四军中设立政委了！“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在我党领导的军队中设置政治委员一职，是我军的规矩和

传统。但是，自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由于国民党的干预与坚持，从国共合作的抗战大局出发，中共中央不得不在我军中取消了设置政治委员的制度。时过不久，八路军恢复了这一制度，重新设立了政治委员。但是，新四军因情况特殊，一直没有设立政委。皖南事变后，中央决定新四军的干部设置以后完全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来决定，并在团以上建制单位中公开恢复设立政委制度。这表明我们党领导的新四军，在干部问题上再也不受国民党的限制了。

其二，新四军军部重建后的第一任政委是刘少奇，可绝大多数指战员对“刘少奇”这个名字还是闻所未闻。陈毅、张云逸、赖传珠、邓子恢等人，是新四军指战员都知道或者认识的老首长了，但刘少奇到底是谁，是啥模样？

因此，命令宣读完毕，许多指战员一边热烈地鼓掌，一边迫不及待地伸长脖颈，瞪大眼睛，在主席台上寻找着新任政委刘少奇。

待到会议进行第二项、代理军长陈毅发表就职演说前，才向大家讲明，刚才宣读中央命令的“胡服”同志就是刘少奇、刘少奇就是“胡服”时，大家才恍然大悟。在这之前，为了保密，刘少奇无论对内对外，一直使用“胡服”的化名，绝大多数人不知其中奥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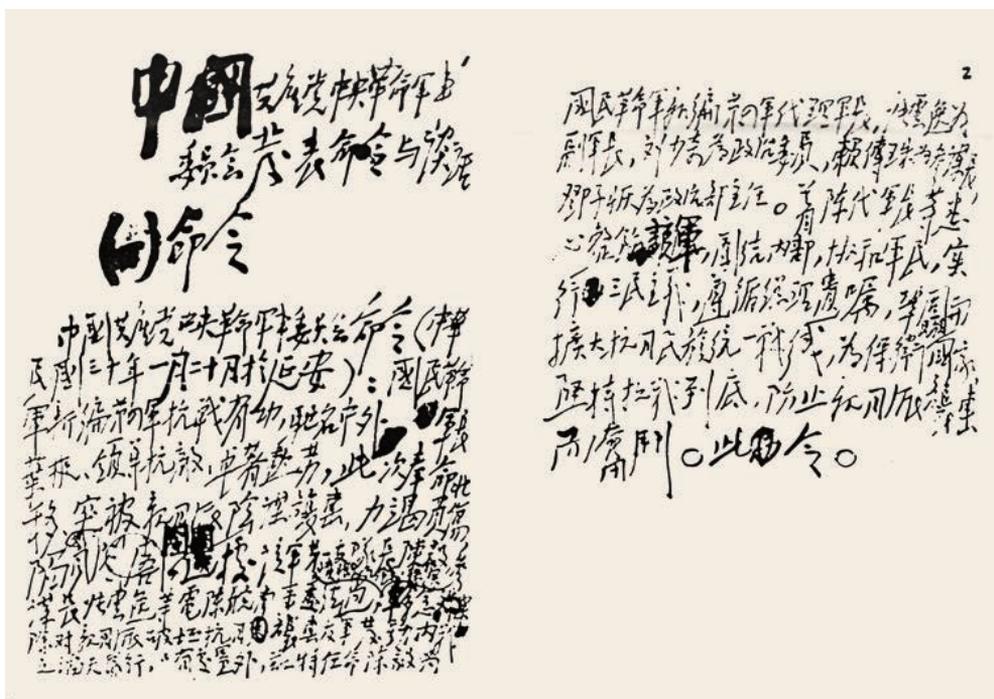
对“胡服”这个名字，新四军的许多干部战士早就耳熟能详了。中共中央早在1938年9月29日到11月6日在延安举行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再次重申了党的独立自主放手组织人民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把主要工作放在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并决定撤销中共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统归中原局领导。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胡服”（刘少奇）同志担任中原局书记，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项英任东南局书记。11月23日，刘少奇就带领10多名干部离开延安，经西安、渑池、洛阳等地，于1939年1月28日抵达河南确山县的竹沟镇，主持成立了中原局。在他领导下，中央局机关高效运转，抗日局面迅速活跃。两个月后的3月18日，他又奉命返回延安参加中央的重要会议。期间，他参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工作，同时仍然负责着中原局的工作，日理万机。

1939年9月21日，刘少奇又率领徐海东等40多名干部再回中原，由延安到达竹沟。因刘少奇的真实身份未公开，对外仍称“胡服”，身份是徐海东将军的“秘书”。途经国统区时，白天，刘少奇总是身着八路军普通军服跟在徐海东后面；晚上，刘少奇在屋内办公，徐海东又在门外担任警戒，将军成了“秘书”的警卫员。为坚决贯彻党中央发展华中的方针，12月初，刘少奇和中原局南渡淮河抵达皖东定远县藕塘镇附近的山黄家村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与张云逸、邓子恢等会合，并从此作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领导中枢，指挥江北敌后斗争。

大名鼎鼎的中央领导人、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兼任新四军政委，足见中央对新四军的高度重视，足见新四军的地位之高。大家为认识刘少奇高兴，更为刘少奇同志担任新四军首任政委而倍受鼓舞，场上长时间掌声雷动。

陈毅在讲话中，回顾了新四军产生、发展的历史，介绍了皖南事变的经过和重建军部的重大意义。当他讲到皖南军部被国民党军包围，我们于1月13日下午与军部失去一切联系后，台下一片静寂，大家都屏住呼吸，担心着军部的最后命运。当陈毅以低沉沙哑的声音沉重地说到“据得到的消息，袁国平同志牺牲，叶挺军长被扣留，项英、周子昆同志下落不明”时，台下立即响起了巨雷般的口号：“打倒亲日派！打倒汉奸卖国贼！打到皖南去，为死难烈士报仇！”

陈毅的情绪一转，语气坚定地讲道：“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绝对吓不倒我们，今天各界同胞就在这里举行庆祝新四军新军部成立的大会。重庆当局发出一个反革



毛泽东亲笔起草的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

命的命令，撤销新四军，我们置之不理。我们拥护共产党恢复新四军的命令，我们要拿革命的命令来反对反革命的命令，拿抗战的命令打倒破坏抗战的命令！新四军是一支特殊的人民军队，具有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精神，具有坚不可摧、不可战胜的力量，新四军是取缔和消灭不了的！皖南事变我们损失了军部，现在军部又恢复了。皖南事变我们有一千个指战员牺牲，但我们今天还有9万人的强大力量。只要我们坚持抗战，坚持斗争，我们是一定能够胜利的，一定有把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定有把握打倒亲日派、顽固派！”

最后，陈毅又特意向大家介绍公开了真实姓名的“胡服”——刘少奇同志，他的话语热情洋溢：“少奇同志是我们党的领袖之一，有20多年的斗争历史。他走到哪里，哪里的革命形势就迅速发展。抗战开始后，他到华北，华北抗日运动就有了大发展；他到皖东，同样展开了大的局面；他到苏北，一样是如此。他是代表中共中央到这里来直接领导我们的。新四军直接在中央和少奇同志的领导下，我们的政治方向不会错，能依照中央的政策做下去，就好像火车在铁轨上走，一定能够顺利地到达目的地！”

作为新四军的首任政治委员，刘少奇也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号召大家一定要牢记皖南事变这一沉痛教训，提高警惕，决不让此类事件重演；要求广大指战员在党中央领导下，戒骄戒躁，英勇奋战，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夺取抗战的新胜利。他坚定地对大家说：“我们新四军是真正抗战的力量，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根植于人民之中的。敌人的阴谋诡计虽然能给我们造成一时的损失，但要消灭我们却是痴心妄想，我们只会越打越强！”

亲历了皖南事变的腥风血雨，突出重围、辗转来到盐城的饶漱石的妻子陆瑾，在大会上声泪俱下地控诉了国民党顽固派疯狂剿杀新四军的种种罪恶行径，把大家带进了刚刚过去的皖南事变的残酷现实情景。所有与会人员，都对顽固派的暴行与狠毒充满了刻骨仇恨，报仇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大会进入了高潮。各界代表也踊跃发言，愤怒声讨顽固派的罪行，热烈庆祝新军部的成立。

会后，盐城广大群众连续3天进行集会游行。盐城，一时成了全华中、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瞩目的焦点，也自此成为苏北乃至华中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

新四军军部的迅速重建，是中国共产党针对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皖南事变的坚决有力的回击。

皖南事变发生后的1月17日，自认为阴谋得逞、洋洋得意的蒋介石即签发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解散新四军的通令”，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

据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删（十五）亥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阴谋不轨，已非一日。本月自泾县潜向南移，竟于四日胆敢明目进攻我前方抗日军队阵地，危害民族，为虎作伥，丧心病狂，莫此为甚。我前方被袭各部队，对此不测之叛变，若不忍痛反击，不仅前线各军之将士无以自卫，而且整个抗战之国策，亦必被其破坏无余。瞻远前途，痛愤无已。取为应付危机，伸张纲纪，不得不为紧急处置。关于该军叛变全部阴谋，业至元（十三）日将会获该军参谋处长之供词，电陈钧鉴。兹已将新编第四军全部解散，编遣完毕，该军军长叶挺于当地就地擒获，该军副军长项英潜逃未获，正在飭部严缉归案……新编第四军抗命叛变，逆流昭彰，若不严行惩处，何以完成国民革命军之抗战之使命。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销，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借申军纪，而利抗战。

同时，国民党在江西上饶设立集中营，残酷迫害新四军被捕人员。

对国民党当局的栽赃诬陷、无耻滥言，中国共产党当即作出强力反驳与回应。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全面揭露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事实真相和严重罪行，号召全国同胞，粉碎少数民族败类发动内战和投降卖国的阴谋。同日，中共中央还向党内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向全党说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的经过，作出在政治上反击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部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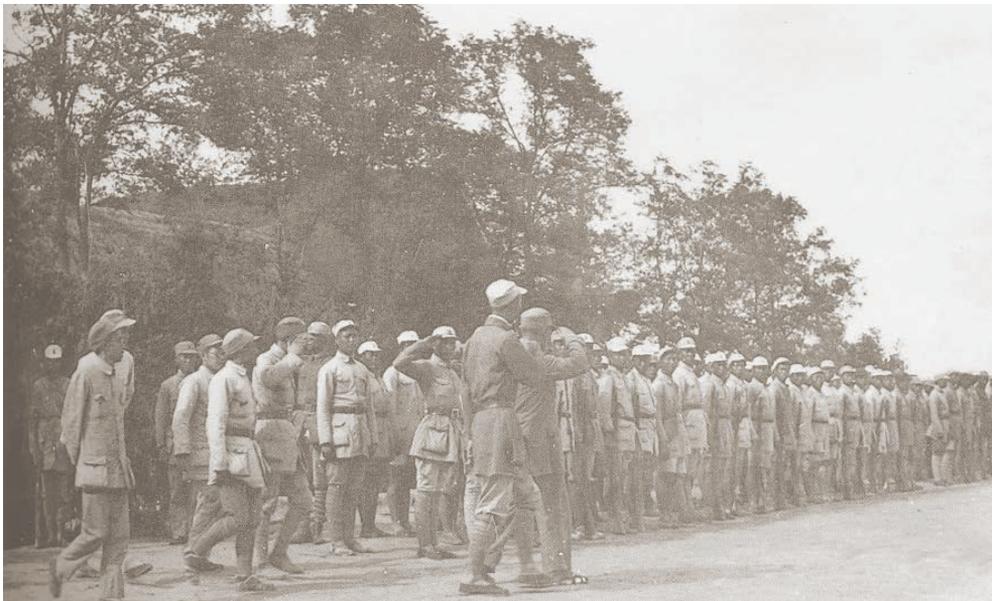
在苏北，中原局书记、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政委刘少奇，代总指挥陈毅，也迅速统一了思想，形成了主见：新四军的命运必须牢牢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决不能接受国民党顽固派的任意摆布，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阴谋诡计，必须针锋相对，坚决斗争。新四军的唯一出路，就是重建军部，让铁军军旗继续高高飘扬！

就在国民党发布反动通令的当天，刘少奇就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报告说：“此间干部提议以陈毅代理新四军军长，立在苏北成立军部，在队号召，可否望复。”18日，刘少奇又与陈毅联名致电中央，再次提议“在苏北成立新四军军部，并以陈毅代军长。”

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纳刘少奇的建议，在苏北重建新四军军部，并确定了主要领导人选。毛泽东亲自执笔，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起草了上述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并在延安发布。

中共中央所以任命陈毅为代军长，是因为叶挺是国共双方正式任命的新四军军长。叶挺虽然被国民党无理关押解职，但是我们仍然承认叶挺是新四军军长，也不承认国民党取消新四军的所谓命令。

1月22日，中央军委发言人就新四军军部重建，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详尽谈话，更加全面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阴谋，指出：“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自日寇和德意订立三国同盟之后，为急谋解决中日战争，遂积极努力，策动中国内部的变化。其目的，在借中国人的手，镇压中国的抗日运动，巩固日本南进的后方，以便放手南进，配合希特勒进攻英国的行动。中国亲日派首要分子，早已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



陈毅代军长检阅
新四军部队

中，为数颇多，日夕煽诱。至去年年底，其全部计划乃准备完成。袭击皖南新四军部队和发布1月17日的反动命令，不过是此种计划表面化的开端……特别是1月17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对新四军，发言人说：“该军在华中及苏南一带者尚有9万余人，虽受日寇和反共军夹击，必能艰苦奋斗，尽忠民族国家到底。同时，它的兄弟部队八路军各部，决不坐视它陷于夹击，必能采取相当步骤，予以必要的援助，这是我可以直率地告诉他们的。”

为抓紧时间，增强时效，1月23日，中央军委便代新四军领导人陈毅、张云逸、刘少奇、赖传珠、邓子恢起草并发表了《就职通电》：

“奉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号日命令……遵即宣誓就职。当此寇氛弥漫、秦桧横行之际，毅等誓遵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与万恶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亲日派奋斗到底。惟望全国袍泽，共矢抗日之忠诚，勿为奸邪所蒙蔽，拒绝内战，一致对敌，民族国家之前途，实深利赖。特电奉闻，敬候明教。”

但是，因当时通讯迟滞不敏，中央军委代为起草的这个就职通电，盐城方面当天并没有收到。因此，1月24日，陈毅在《江淮日报》上又发表了一个《就职通电》：

“……毅以庸愚，身处前线，于此危局惨变，按诸抗战职责，断无消极退让之理，遂于1月敬日应本军将士推选，本人就职并代理军长，克日于苏北盐城恢复军部，统率全军9万之众，誓与日寇汉奸反共投降派奋斗到底！本军志以至诚推行革命之三民主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政策方针，绝无因皖南事变及反共投降派之大举进攻，而放弃抗日救国神圣职责。急盼全国抗战党派，全国抗战将士，各界同胞，与本军团结一起，为争取中华民族之解放共同奋斗。本军一息尚存，斯志不容稍懈。”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和陈毅等的就职通电一传出，全国人民特别是新四军的广大指战员，人心大振，欢欣鼓舞，拍手称快，奔走相告。他们从我党中央和新四军军部的态度上，看到了我党我军坚定不移的抗战立场和决心，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前途与希望，更看到了我们党已经不像大革命失败前那样、容易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谎言欺骗、轻易被国民党当局扼杀，而是有着自己坚定的政治主张和策略的日益成熟的大党。

新四军军部重建后，原来的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完成了时间虽短但十分重要的历史使命。重建的新四军军部，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设置完善了内部各机构，包括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军工部、财经部等。重建后的军部机关，像一个健全灵敏的大脑，各项工作迅速、高效地运转起来。

司令部：先驻于城郊1公里处的熊家祠堂，后移驻于城里的泰山庙（又称东岳庙），下设参谋处、政治处。参谋处是最重要的业务机关，由作战、侦察、通信、机要、训练、管理等科组成。刘少奇、陈毅等军首长随司令部工作和居住。

政治部：驻于城西两公里处的仓头，下设组织部、宣传教育部、锄奸部、敌工部、直属政治部及秘书处。

供卫部：供给部驻于城西护城河桥头，下设军实、粮秣、会计、管理等科。卫生部驻于城东南海神庙，下设医政、保健、材料、管理等科及后方医院。后来，供给部与卫生部合并，称供卫部。

军工部与财经部：设工务、材料、人事等科。财经部设稽征、生产建设、审计、会计、总务等科。后来，军工与财经两部撤销。

为了理顺与加强军队内部、军队与地方党政领导体制与关系，2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颁布了《军政委员会条例》，规定团以上部队成立军政委员会，作为各级集体领导机关；以前军队与地方党政合组的军政委员会改称“军政党委员会”。至4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了新四军各师军政委员会组成，7个师的军政委员会书记分别为刘炎、张云逸、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谭震林、曾希圣。

新四军军部重建后，中共中央又进一步调整健全了华中地区党和军队的领导机构与体制。3月2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中原局由刘少奇、饶漱石、曾山、陈毅4人组成，刘少奇任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华中分会（新四军分会）由刘少奇、陈毅、邓子恢、赖传珠、饶漱石5人组成。后来，中央考虑到中原局所辖范围已经大大扩大，而东南局因书记项英遇害、副书记饶漱石突围到了苏北，已经名存实亡，故决定撤销东南局，将其并入中原局。4月27日，中原局举行会议，决定改称华中局；5月20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并决定由刘少奇任书记，饶漱石为副书记，曾山、陈毅为委员。5月22日，中共中央又决定军分会改由刘少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赖传珠组成，刘少奇任书记；饶漱石则出任新四军政治部代主任，不久任主任。

新四军军部的重建，宣告了蒋介石剿灭新四军反共阴谋的破产，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彻底失败。在共产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下，国民党和蒋介石不得不稍作收敛，继续维持国共合作的局面。同时，军部重建又标志着历经磨难的新四军在濒临绝境时重新站立了起来，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新四军军部重建，也引起了日寇的恐慌和仇视，对盐城的大轰炸从此不断。就在军部重建几天后，军部与华中局在孔庙东南的盐城图书馆召开高干会议。会议由刘少奇、陈毅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军部和各部队的主要领导30多人。上午会议正在进行时，日寇4架飞机突然来袭，在军部驻地和会场上空疯狂地投弹扫射，两名会议保卫人员当场牺牲，9名战士负伤。一枚炸弹就在距离刘少奇和陈毅只有二三十米的地方轰然爆炸，猛烈的气浪掀起的泥土洒了两人一身。敌机飞离后，刘少奇若无其事地站立起来，一边掸着身上的灰尘，一边幽默地说，“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我们开会。”当天下午，日军飞机又来了两次，每次6架，四处轰炸，遍地乱扫。此后几天，敌机不断来进行骚扰。为了安全起见，会议只得提前结束，军部也暂时疏散到盐城近郊办公。猖狂的日寇也遭到了有力的惩罚，新四军第3师的部队用机枪回击敌机，日军一架105号战机被击中坠落，敌飞行员毙命。

林浩：从一介书生到开国少将

夏明星



1942年，林浩（右）与许世友的合影

开国少将林浩逝世后，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迟浩田这样评价：“我党失去了一位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的老战士，人民军队失去了一位优秀政治工作领导者和军事教育家，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战友、老首长。”称赞他“在逆境时百折不屈，在顺利时不骄不躁，带兵打仗有勇有谋，治军治校勇于创新”。

从一介爱国书生长为中共在山东地区的重要领导人

林浩，原名尹圭璋，又名尹浩林。在开展党的秘密工作时，他将“浩林”演变成了化名林浩。1916年1月6日，林浩出生在山东省牟平县（现烟台市牟平区）一个富农家庭。青少年时代他就阅读了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著作，接触了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1933年10月，经在济南乡村师范工作的共产党员赵健民介绍，刚刚进入高中就读的林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在国民党政府“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血腥镇压下，中共在山东的上层组织惨遭敌人两次大破坏，基层组织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处境十分险恶。面对白色恐怖，面对反动派带血的屠刀，林浩毫不畏惧，奋不顾身地投入殊死的战斗，先后担任中共济南高中支部书记、中共济南市工委委员。他和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寻找上级党组织，同时利用“读书会”“同乡会”广交朋友，宣传进步思想，在充分了解和考验的基础上秘密发展党员，为党积蓄了一批力量。1935年底，林浩参加组织了济南高中、乡村师范、育英中学、第一中学和第一师范等学校的罢课活动，声讨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华北，强烈要求抗日，以实际行动声援北平学生的“一二·九”运动。

1936年夏，刚刚高中毕业的林浩担任了中共山东省宣传部长兼济南市委书记，成为山东党内极有影响的人物，当时他年仅20岁。当年9月，他临危受命，只身来到费县师范讲习所，以语文兼数学教员的职业作掩护，开展党的秘密工作。他常常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盯梢和监视，在学生中开展工作，通过谈话、讲演会、办刊物等形式，宣传进步思想和党的抗日救国方针。

1937年春，林浩与其他同志一起，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敌后援委员会，开展募捐活动，发动抵制、焚毁日货活动，支援傅作义部在绥远抗战，把济南的抗日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7月，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党中央指示：山东党组织要迅速动员组织人民，积极准备开展游击战争，把坚持抗战的责任独立自主地担当起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了“每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林浩带头响应号召，走上火热的抗日战场。

10月，中共山东省委转移到泰安，林浩担任了省委副书记。他积极组织工人、学生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为山东革命的发展和党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领导人到 “中共胶东抗日根据地的一把手”

1938年1月，林浩与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等领导同志一道，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直接领导了包括泰安、莱芜、泗水、宁阳、沂水及泰西大峰山地区的徂徕山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不久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林浩先后兼任支队政治部主任、政委。当时，参加徂徕山起义的人员来自方方面面，他们中有红军干部、工人、农民、士兵，还有学生、教职员；服装也各式各样，有的穿棉袍、马褂，也有穿西装、制服的；手持的武器更是五花八门，有匣子枪、“汉阳造”，也有“老套筒”“土压五”，还有大刀、梭镖。在林浩的鼓励下，虽然大家穿着不一，武器破旧，但却一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武装抗日大旗一举，素有精忠爱国、抗击外侮光荣传统的齐鲁人民八方呼应，起义部队迅速扩大到700多人。1月26日，部队在泰安县寺岭村伏击，首战告捷，毙伤日军10人，击毁日军汽车1辆；2月18日，再战泰安县四槐树，炸毁日军汽车两辆，歼敌40余人，内有日军大佐1名。起义队伍随即开辟了以莱芜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打击了山东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增强了山东军民的抗战信心。1939年3月，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率部抵达沂蒙山区，听取了第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政委林浩的汇报，并扼要地向他们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称赞林浩：“你才23岁呀！了不起，了不起！”

1939年夏，林浩担任了中共山东一区（即大鲁南区，含津浦路以东、胶济路以

南、陇海路以北地区)党委书记、一军区(也称山东纵队后方司令部)政委,卓有成效地领导了泰安、沂蒙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工作。1940年秋,24岁的林浩担任了中共胶东区党委书记兼胶东军政委员会书记,成为“中共胶东抗日根据地的一把手”。在他的领导下,“胶东有兵工厂,可造炸弹、炮弹、步枪、机枪、掷弹筒、迫击炮,还可翻造子弹。除此之外,各区还有纺纱、织布、制革、造纸、鞋袜等小工厂。胶东、鲁南还有金矿,月产黄金12两。他们在金融流通、统制贸易等方面也有所开辟,由共产党控制的北海、鲁西银行及分行年发行新钞700万元,泰山农民合作社还发行地方票。节约、生产、金融、贸易,用以解决每年每人平均130元左右耗费的大部分,大大减轻了民众负担”。(见《徐向前传》)

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制造“皖南事变”,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在胶东区,赵保原、蔡晋康等顽固派与日军狼狈为奸,多次对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发动军事进攻,抢占敌后军民创建的牙山根据地,并联合向东海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企图消灭山东纵队第五支队。遵循党中央“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根据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指示精神,胶东军民于1941年3月15日发起反投降战役。以许世友任指挥、林浩兼任政委、吴克华任副指挥的反投降临时指挥部,指挥山东纵第五旅、山东纵队新五支队和清河军区独立团等6个团的兵力,首先东西对进,一举收复牙山地区。接着,挥师南下海阳,直逼投降派头子赵保原据守的郭城、发城地区,展开了围困战,迫敌退回其老巢。此役,共歼灭国民党顽固派军队1.5万余人,把大小十几支顽军部队逐出胶东腹地,打通了胶东之东、西两区的联系。经过近5个月的反投降作战,进一步扩大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扭转了与顽固派斗争不利的局面,为实现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指导思想,创造了重要的条件。这次战役胜利,获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数次通电嘉奖。

搭档著名战将许世友,领导胶东抗战取得最后胜利

1942年7月,胶东军区成立,许世友任司令员,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兼任军区政委。当年冬,日军1.5万余人加上伪军5000余人,配备10余架飞机和26艘军舰,在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下,对胶东根据地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扫荡”。林浩临危不惧,他同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副司令员吴克华等领导一起,组织指挥了一次又一次较大规模的作战,在40多天的反“扫荡”战斗中,八路军英勇作战,歼敌2000多人,救出了被日军包围在马石山上的群众2000多名,粉碎了日、伪军对胶东抗日根据地最大规模的“清剿”“扫荡”。胶东军民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保存了力量,保卫了根据地,闯过了抗战时期这一最艰苦的时期。

1944年8月,为改善胶东境内东海、北海、西海、南海4个根据地的联系,林浩、许世友领导胶东军区对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秋季攻势。到9月下旬,在40多天里,歼日军5000余人,攻克、迫敌放弃据点130余处,使4个根据地完全联成了一片。

1945年春天,遵照上级指示,为了给胶东区抗战反攻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区党委和军区领导经研究决定:于2月11日发起讨伐胶东顽伪“双料”叛军头子赵保原的战役。林浩与吴克华等军区负责人一起,组织指挥了这场重要战役。经9天连续作战,共歼灭赵保原主力万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解放人口70多万。这次战役,清除了山东顽军一个重要堡垒,剪掉了日军在胶东的重要羽翼,扫除了胶东对敌大反攻的重大障碍。此后,林浩和军区参谋长袁仲贤又指挥胶东所属部队,发起了对



林浩指挥的胶济路
东段自卫战役

与日军勾结并屡屡向我西海南海军分区侵袭的顽军阎珂卿、王豫民等部的讨伐，歼敌5000余人，击溃其大部。从此，胶河两岸全为八路军控制，为抗战大反攻进一步创造了条件。当年8月，抗战大反攻到来之际，胶东军区部队作为山东军区5路大军的第三路，“在前线指挥许世友、政治委员林浩率领下，解放威海卫、牟平、烟台、福山、蓬莱、黄县、龙口、招远、莱阳、石岛、即墨，并突破了敌之崂山防线，攻占了流亭机场，逼近青岛”。（见《罗荣桓传》）

抗战期间，胶东招远等县作为黄金重要产地，是日军进行经济掠夺、以战养战的必争之地。林浩领导胶东区党委带领根据地军民向日军展开了激烈的黄金争夺战，并向中共中央提供了13万两黄金作为抗战经费。在开展对敌斗争的同时，根据地的文化艺术工作也比较活跃，区党委先后组织了“国防”“前线”、孩子剧团和京剧团等文艺团体，出版发行了《大众报》等不少报刊，创作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品，锻炼出一批颇有名气的作家和作者。

林浩还狠抓根据地和党的各项建设，通过在斗争实践中磨炼及办抗大胶东分校、胶东党校、胶东公学、胶东建国学校等，培养和造就了成千上万的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干部。他们中有的跟随主力部队转战南北，血洒疆场；有的在当地或调到外地领导政权建设。当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时刻，胶东地区培养造就的干部在全国各地、各条战线上大显身手，有相当一部分成了党、国家和军队的中高级干部。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山东“整风审干”时，胶东党校和整风训练班中很大一部分党员被打成了“特务”，许多人跑到区党委书记林浩那里哭鼻子。林浩坚信不可能有那么多“特务”，就向罗荣桓作了报告。罗荣桓指示：“不能再这样搞了，整风不能没有领导，不能搞逼供信，要他们迅速停止错误的做法，把搞的那些错误材料全都烧掉，干部还照样使用。”（见《罗荣桓传》）

从领导胶东解放战争到投身军事院校教育

1945年8月起，抗战的硝烟尚未散去，林浩又投身于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他继续担任胶东区委书记兼胶东军区政委，先后抽调10个团的兵力和大批干部，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协助抢占东北的战略任务。据不完全统计，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胶东地区先后有近50万人参军，20余万民兵协同部队作战，上百万民工支援前线”，“这片只有800万人口的根据地，竟组建了4个野战军，有的民兵整连、整营地加入正规军行列。胶东人民组成的一个又一个担架营、小车队等随军参战，车轮滚滚，随军南下，跨淮河、渡长江，参加解放大上海”。作为党在胶东地区相当长时间内的最高领导人，林浩的功劳不可抹杀。

1947年1月，胶东军区部队奉命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许世友任司令员），林浩兼任纵队政委、党委书记，参加指挥了胶济路东段自卫战役、掖县沙河镇阻击战和胶东保卫战，“和许世友一起度过了山东解放战争中最艰苦的日子”。

1947年底，内线作战刚结束，林浩奉命参加中共中央华东局土地改革会议。在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和康生的主持下，会议错误地批判黎玉、林浩所谓土改“富农路线”，免去了林浩胶东区党委书记、胶东军区政委和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政委等一切职务，整整让他坐了大半年的冷板凳。回忆往事，林浩感慨地说：“1945年4月下旬，毛主席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讲，‘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有好的态度。家庭里是很少有开除家籍的事情的。阿Q到底姓什么虽不清楚，但也没有听说他曾被开除家籍。’我的所谓‘问题’不清不楚，却近似于被开除党籍了！”因为这一打击，解放军于1955年9月第一次评授军衔时，威望、资历、战功都堪称突出的林浩，仅仅被授予少将军衔。

1948年6月，林浩被调到中共中央华东局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员，3个月后又调到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在中央马列学院学习的两年半时间里，他没有把“学习”当作组织上对自己的“处理”，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学习，他认真阅读了大量的马列原著和毛泽东著作，写下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使他在理论上和思想上又有了新的飞跃，为他以后在军事院校担任领导工作和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1年春天，在胶东办过抗大胶东分校、胶东党校的林浩，被安排到南京军事学院工作，先后担任政治部教育部长、宣教部长、政治部副主任、院党常委等职，在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的直接领导下，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特别是军队院校的教育工作，做出重要贡献。难得的是，他常年坚持亲自授课，先后讲授过哲学、中共党史和军队政治工作等课程，被军事学院授予授课工作甲等奖。1956年1月15日，军事学院建院5周年时，又被授予教育工作二等奖。

1957年8月22日，高等军事学院在北京成立（院长刘伯承），林浩又被调到高等军事学院工作，历任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院党常委。在此期间，林浩和学院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改革政治教学，开门办学，邀请专家学者来院讲学。如杨献珍、艾思奇等多次讲过哲学；许涤新、薛暮桥等讲过政治经济学；有关国内外大事，曾请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作报告；农业部长廖鲁言、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等，也应邀来院作过报告。此外，林浩还和大家一起，自己动手，编写了《抗登陆政治工作》《阵地战政治工作》《运动战政治工作》《防空战政治工作》等一系列教材，继承和发扬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我是政治学院院长，讲话当然要讲政治”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浩再次遭受打击。1978年底，在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的举荐下，他被任命为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党委第二书记，领导政治学院大张旗鼓地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认真纠正林彪、“四人帮”对军队院校工作的干扰破坏，为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有关拨乱反正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推动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了大量工作。

当时，受总政治部的委托，政治学院举办了正军职以上领导干部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培训班，一连搞了3个月。林浩以亲身经历，向正军职以上领导干部讲述“左”倾路线的祸害，阐述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收到了极好的教育效果，得到了邓小平的赞扬。面对表扬，林浩淡然一笑：“我是政治学院院长，讲话当然要讲政治！”

林浩在任政治院院长的5年间，几乎没有休过星期天和节假日，全身心地投入到学院的各项工作。保健医生劝他注意休息，他说，我很多年没有为党工作了，年龄也不小了，应利用不多的时间为党多做工作。为此，他家里到晚上10点钟吃晚饭，是常有的事情。

在担任政治学院院长期间，林浩还为很多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莫须有罪名的干部战士平反昭雪。在上下班途中，他只要见到站在路旁，拿着申诉材料等候他的部队人员，总是停下车来，亲自收下这些申诉材料，并积极为这些遭受不白之冤的同志平反。为此，当时的《人民日报》曾经写过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我们党多些这样的干部该多好啊》。

林浩一生酷爱读书，有口皆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并没有因为参与指挥千军万马而放松看书学习。他身边的同志们都知道，林浩有一个小书箱，行军打仗都随身带着，走到哪里学到哪里。1978年底担任政治学院院长后，他在该院大会上的第一次讲话，就博得学院中高级干部的热烈掌声：“中高级干部要认真看书学习，‘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既是他对干部学习的要求，也是他个人的读书体会。1983年6月，年近七旬的林浩退居二线。他在全院大会上发表的卸任讲话，仍然强调大家要加强学习。他说：“我虽然退下来了，但我的身体还好，我要向在座的同志们发出挑战，我们来个学习竞赛好不好？”台下又一次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1996年11月14日，林浩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享年80岁。



北魏宰相王肃一家

谢燕颀



《洛阳伽蓝记》不仅是一部重要的佛教典籍，而且也是具有文化与文学价值的历史文献，使当时洛阳地区的诸多掌故、风土人情和中外交流事件得以保存。

据《洛阳伽蓝记》卷三载：

“劝学里东有延贤里，里内有正觉寺，尚书令王肃所立也。肃字公懿，琅琊人也。伪齐雍州刺史奂之子也。赡学多通，才辞美茂，为齐秘书丞。太和十八年，背逆归顺。时高祖新营洛邑，多所造制，肃博识旧事，大有裨益。高祖甚重之，常呼王生。延贤之名，因肃立之。”

说的是洛阳城南劝学里东的延贤里有一座正觉寺，为北魏尚书令王肃所建。据《魏书·王肃传》载：“王肃，字恭懿，琅邪临沂人，司马衍丞相导之后也。父奂，萧贲尚书左仆射。肃少而聪辩，涉猎经史，颇有大志。仕萧贲，历著作郎、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秘书丞。肃自谓《礼》《易》为长，亦未能通其大义也。父奂及兄弟并为萧贲所杀，肃自建业来奔。是岁，太和十七年也。”

王奂（？-493），字彦孙，初为刘宋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元徽初为晋熙王征虏将军长史、江夏内史，迁侍中，领步兵校尉，晋熙王镇西将军长史，加冠军将军、江夏武昌太守，征祠部尚书，转掌吏部，升明初迁冠军将军、丹杨尹，出为吴兴太守，进号征虏将军。齐高帝萧道成受禅后，进号左将军，迁太常，仍转侍中、秘书监，领骁骑将军，又迁征虏将军、临川王镇西将军长史、领南蛮校尉、南郡内史，进号前将军。齐武帝萧赜即位后，征右仆射，转使持节前将军湘州刺史，徙散骑常侍、江州刺史，迁中仆射、本州中正，迁尚书仆射、领军将军，转左仆射，加给事中，出为使持节、镇北将军、雍州刺史。永明十一年，北魏太安十七年（493），擅杀宁蛮长史刘兴祖，又举兵拒命，兵败后连同几个儿子皆为齐武帝萧赜所杀，王肃被迫自建业投奔北魏。

王肃于太和十八年（494），背叛南齐而归顺北魏。当时北魏高祖孝文帝元宏新建洛阳城，增加了很多建筑，王肃博学多才，明了旧制，高祖甚器重他，常呼他为“王生”。“延贤”里得名，是因王肃起。

北魏高祖孝文帝元宏听说南朝王肃来投，就亲自接见，讯问事情缘故，为其不幸的遭遇而深表同情。转而谈及安邦治国的大道理，王肃侃侃而谈，全面陈说治乱理论，孝文帝甚表惊叹，从而接受了他的观点。

因谈及南齐萧氏王室危机重重，已显覆灭的征兆，有可乘之机，王肃力劝孝文帝讨伐之。他因全力出谋献策，因而所受的礼遇也日益增加。王肃深受器重，亦尽力报答，以贡献忠诚，且无所隐瞒回避。他自认为君臣相得，如同当年刘备遇诸葛亮。

孝文帝封他为辅国将军、大将军长史，赐于开阳伯爵位。王肃因无功不受禄，力辞伯爵地位，接着领兵讨伐弑主自立的南昌齐明帝萧鸾。

王肃进军义阳，频频破敌，降者万余。孝文帝为此特派遣散骑侍郎前往军前慰劳，以功进号为平南将军。

王肃善于待人接物，迎合安抚，治军亦有声誉。太和二十年七月，孝文帝以久旱不雨，辍膳三旦，百僚诣阙，引在中书省。就关于求雨上天的一番君臣对话，王肃又深深感动了孝文帝，亦感动了天地，因为是夜果真澍雨大降。

王肃因破南齐名将裴叔业有功，又进号镇南将军，加都督豫、南兖、东荆、东豫四州诸军事，封为汝阳县开国子爵，食邑三百户，持节、中正、刺史如故。王肃频频上表固让，不许。孝文帝亦奖罚分明，后王肃因坐刘藻等败，被黜为平南将军，中正、刺史如故。

北魏孝文帝高祖元宏崩，临死亦有遗诏重用，以王肃为尚书令，与咸阳王元禧等同为宰辅，征王肃会驾鲁阳。

因裴叔业以寿春内附，继位的北魏宣武帝元恪拜王肃为使持节、都督江西诸军事、车骑将军，并令其与骠骑大将军、彭城王勰率步骑十万以赴之。

后以王肃在淮南频传捷报，加赏帛四千七百五十匹，进位开府仪同三司，封昌国县开国侯，食邑八百户，余如故。接着又以王肃为散骑常侍、都督淮南诸军事、扬州刺史、持节，余官如故。

王肃频在边境，能悉心抚接，远近归怀，附者若市，又以诚绥纳，咸得其心。自己清身好施，简绝声色，终始廉约，家无余财。人无完人，他性微轻佻，颇以功名自许，护疵称伐，少所推下，孝文帝每以此为言警告。

景明二年王肃逝于寿春前线，年仅三十八岁。世宗宣武帝元恪为之举哀。有诏说：“故扬州刺史肃，诚义结于二世，英惠符于李杜，平生本意，愿终京陵，既有宿心，宜遂先志。”赠封侍中、司空公，本官如故，谥“宣简”。

后来，北魏肃宗孝明帝元诩亦有诏为王肃建碑铭，其子王绍袭封。据《魏书·王肃传》载：“（王）绍，肃前妻谢生也，肃临薨，谢始携二女及绍至寿春。”

其实王肃在南齐时已娶谢氏为妻，但到了洛阳又尚陈留公主。谢氏因家难去尼姑庵做了尼姑，后来北方投奔王肃，见丈夫已尚公主，乃作五言诗一首寄赠之，她在诗中说：“本为箔上蚕，今作机上丝。得路逐胜去，颇忆缠绵时。”意为自己本是竹箔上的春蚕，今天已变成了织布机杼上的蚕丝，喻自己已由一名少女变成一名少妇。好不容易到了北方，获得了生路，而可继续追寻名胜风景去，现在无奈之下只能追思回忆起那逝去的缠绵时光。

王肃无言以对，只好由陈留公主代为作诗以答：“针是贯线物，目中恒任丝。得帛缝新去，何能衲故时？”诗的意思是，针是引线之物，针眼中常穿有丝线，今得到了新的丝绸要缝纫，哪能再去缝纫旧的百衲衣？可见陈留公主很委婉地拒绝了谢氏重归家庭的要求。

王肃甚感惭愧，同时出于感激，遂建造正觉寺让她居住。王肃当时也是假扮僧人逃到北魏去的。谢氏先到寿春，再到洛阳，但到北方后不久，丈夫已归他人，且不久就逝世了，她一个人带着几个儿女艰难度日。

王肃一想起父亲的死难，常常有伍子胥归报楚王仇的愿望。便衣素服，不听音乐，时人常以此称赞他。他初到北魏，不食羊肉以及奶酪等食物，常用饭泡鲫鱼汤，口渴喝茶。京城的读书人，说王肃一次可喝一斗，故取外号为“漏卮”。意思是说他这张嘴好像破漏的茶壶，永远填不满。

几年以后，王肃与高祖在殿上会餐，已能食羊肉、奶酪。高祖感到奇怪，就对王肃说：“卿为中国口味，羊肉比鱼羹怎样？茶茗比奶酪如何？”王肃说：“羊是陆地最好的食物，鱼乃水中最好的食物。以味道来说，甚有优劣可较。羊肉好比齐、鲁等大邦，鱼好比邾、莒等小国。唯有茶茗不中用，只能与奶酪服务。”

高祖大笑，因而举起酒杯说：“三三横，两两纵，谁能辨之赐金钟。”御史中尉李彪说：“沽酒老妪瓮注瓦，屠儿割肉与秤同。”尚书右丞甄琛说：“吴人浮水自云工，妓儿掷绳在虚空。”彭城王元勰说：“臣此时才理解，此字是习字。”高祖即以金钟赐李彪。

此段对话颇可玩味！笔者认为元宏像是在用王肃的名字开涮、取笑。繁体“肃”字，为三个三横，两个两竖，又象个酒卮。

彭城王元勰对王肃说：“卿不看重齐鲁大邦，而喜爱邾莒小国。”王肃回答说：“乡村小曲之所以好，没有得到是不好的。”彭城王又说：“卿明天来看我，我为卿准备邾国、莒国的食物，亦有‘酪奴’。”从此又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酪奴”。

当时给事中刘缜羡慕王肃的作风，专门学习茗茶，于是彭城王对刘缜说：“卿不羡慕王侯的八珍食品，却喜好奴仆的‘水卮’。海上有逐臭趋腥的渔夫，乡里有效颦的东施，以卿来说，即是。”卮气，倒霉气。水卮典故，出自东晋王濛。

其时彭城元勰王家有南方奴仆，故以此话戏谑他。自此以后，朝中贵官宴会，虽然准备了茗茶，却均耻于此而不再喝，只有长江以南地区流落远来投奔者喜欢它。后来萧衍之子萧正德来归降时，元勰想为他准备茗茶，先问说：“卿能喝‘水卮’多少？”萧正德回答：“下官生于水乡泽国，而立身以来，还没有遭受阳侯之难。”元勰与在座的客人都放声大笑。阳侯，即辟阳侯，西汉酈食其的封号。初以舍人侍吕后，夤缘迎合，奉命维谨，渐为吕后所宠幸。高祖称帝，封为辟阳侯。吕后时，任左丞相。公卿皆因而决事，权势极大。后借指后妃所宠幸的嬖臣、面首。



北魏孝文帝出行

二

王肃身居异国他乡，虽受皇上恩宠，却也难免受人取笑；虽尚公主身为驸马，更无颜面对结发妻子。

王肃于太和十七年（493）仓惶北奔入魏，时年三十，正当壮年。王肃尚陈留公主时，在景明元年（500），这一年王肃也就37岁，陈留公主33岁左右。

谢氏不得已而出家为尼，得以机会北逃。在寿春见到了王肃，本向往已久的夫妻欢聚，今变成艰难见面，他们的心情都异常沉重。

王肃即在自己居家所在的洛阳延贤里，建了一座正觉寺，把谢氏安置其中。谢氏被迫真正出家，好在自己有一儿二女，可以随时相见。

不久王肃突然病死，又使谢氏的人生发生新的变化。刚刚从南朝到来的王肃的儿女，才真正构成了王肃的家庭。谢氏此后并没有还俗，她和儿女之间的家庭生活应当基本上是正常的。

谢氏带到北方来的二女一儿，大女儿王普贤和儿子王绍。王肃死时，王普贤15岁，王绍十岁，二女儿应当在二者之间。

王绍，字三归，官至太子洗马、员外常侍、中书侍郎，赠辅国将军、徐州刺史。子王迁袭封。

王绍得以继承王肃的昌国县开国侯爵位，而王普贤则被选入宫中，世宗宣武帝曾封王普贤为贵华恭夫人，后肃宗又纳王绍女儿为嫔。

据《南齐书》卷五七载：“（王）肃初奔虏，自说其家被诛事状，（元）宏为之垂涕，以第六妹伪彭城公主妻之。”

彭城公主，是北魏孝文帝元宏的六妹，前夫刘承绪。

刘承绪是宋王刘昶之子，宋文宗刘义隆之孙，残疾，早死。太和二十一年，宋王刘昶（刘承绪之父、宋文帝之子）死于彭城，彭城公主避讳而改称陈留公主。

陈留公主正当盛年却成了寡妇，并无子女，就回到皇宫里居住了。北魏孝文帝冯皇后希望她嫁给自己的弟弟冯夙，孝文帝也同意了，可是公主看不上冯夙。

孝文帝死时，陈留公主最多也就30出头，守寡好几年了。陈留公主再次寡居时，年龄不会超过35岁，好在她并无子女，所以王肃死后也无须继续留在延贤里，于是重新回到了过去的生命轨道，漂泊着无所依归。

据《魏书》卷六四《张彝传》：“时陈留公主寡居，（张）彝意愿尚主，主亦许之。”记录了陈留公主又一次谈婚论嫁的情况。张彝出身清河张氏，才望俱显，

妻子病故，正要续弦。你情我愿，再好不过。

据《资治通鉴》卷一四五所载，这是景明三年（502）的事。这一年，张彝41岁，公主约有三十四、五岁，寡居也差不多有一年了。可是，斜次里又杀出一个高肇，他也看上了陈留公主。高肇是宣武帝的舅舅，时任尚书左仆射，正是炙手可热的权臣。

陈留公主先后所嫁，一为刘宋皇室后裔，一为琅琊王氏的名士，有这样的经历，使她的见识必有不同凡响。对于高肇的求婚，她干脆地拒绝了。这一下激怒了高肇，于是就在政治上陷害张彝，旨图阻挠陈留公主的婚事。不久张彝中风偏瘫，后来的情况史料未载。

三

据《北史·列传》第三十载：“（王）绍，王肃前妻谢生也。肃临薨，谢始携女及绍至寿春。宣武纳其女为夫人，明帝又纳绍女为嫔。”

王绍与王普贤都有墓志留存，墓志中描述北投王肃的经历，王普贤墓志说：“痛皋鱼之晚悟，感树静之莫因，遂乘险就夷，庶恬方寸。”王绍墓志则说：“年裁数岁，便慨违晨省，念阙温清，提诚出岵（险），用申膝庆。”

好不容易见到父亲，但他很快就病死，对于这一家离乡背井、远赴异国的人来说，沉痛哀伤，实非他人所易感知。王普贤墓志说：“惟（天）道冥昧，仍罗极罚，茹荼泣血，哀深乎礼。”王绍墓志说：“天道茫茫，俄踵极罚，婴号茹血，哀瘠过礼。”

王普贤死于孝明帝延昌二年（513），年27；王绍死于延昌四年（515），年24。两人的墓志都介绍了父母和祖父母，都提到王肃的夫人是谢氏，为梁右光禄大夫谢庄之女；王普贤墓志还提到王肃“后尚陈留长公主”。

据《魏故贵华恭夫人墓志铭》载：“祖奂，齐故尚书左仆射、使持节、镇北大将军、雍州刺史。夫人陈郡殷氏，父道矜，太中大夫。父肃，魏故侍中、司空、昌国宣简公。夫人陈郡谢氏，父庄，侍中、右光禄大夫、宪侯，后尚陈留长公主，父献文皇帝。魏故贵华夫人王普贤，徐州琅耶郡临沂县都乡南仁里人也。”

据《魏故辅国将军徐州刺史昌国县开国侯王使君墓志序》载：“〔王绍〕祖奂，齐故尚书、左仆射、使持节、镇北将军、雍州刺史。夫人陈郡殷氏，父道矜、太中大夫。父肃，魏故侍中司空昌国宣简公。夫人陈郡谢氏，父庄、右光禄大夫、宪侯。君讳绍，字安宗，徐州琅耶郡临沂县都乡南仁里人也。”

王肃前妻谢夫人，有文才、胆识、睿智。她出生在一个显赫的家庭，命运却非常坎坷。

父亲谢庄、兄长谢朓身居相位，兄长谢颺、谢澹亦官高一品，侄女谢梵境为母仪天下的皇后。也正因为如此，当年她夫妇两人及子女才得以先后逃亡北朝，虽背井离乡，却留下了性命。

但是，谢夫人的确命苦，假如她与王肃同年，则二岁丧父，30岁家遭罹难，38岁夫亡（王肃，景明二年亡），49岁丧女（王普贤，延昌二年亡），51岁丧子（王绍，延昌四年亡），55岁丧孙（王迁，幽州刺史，神龟二年二月亡）。只留下一女，艰难度日。结局如何，不得而知。

舒祥与《沂州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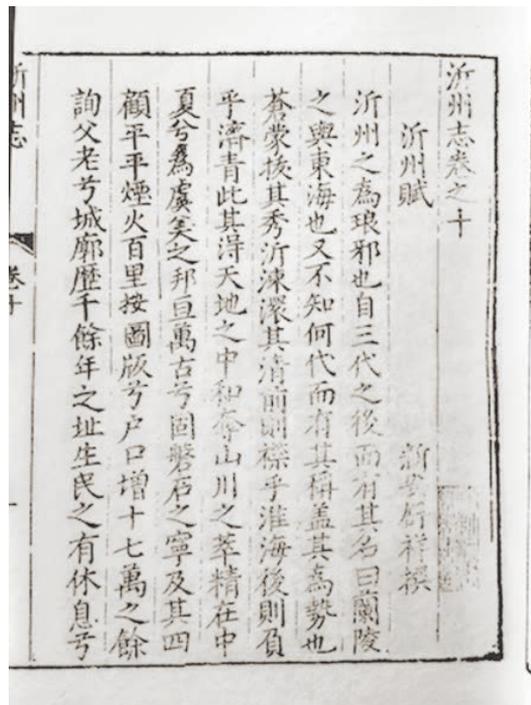
丁富强

临沂市最早的沂州旧志，迄今为止最权威的说法是“有目无书”的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7年）沂州知州何格主修的志本《沂州志》；“有目有书”的为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沂州知州徐汝冀重修的十卷本《沂州志》”。这种说法是否经得起历史史料的证明，在临沂方志研究领域来说是一个重要问题，可惜过去还没有人认真深入探究过，偶尔提及多是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笔者系史志领域中的初涉者，偶然的机会接触了这个问题，接下来又有了较有收获的探索。经多方查证而草成的这篇文章，是对临沂旧志纂修时间研究的尝试，望能得到方志专家学者和史学爱好者的批评与指正。

明舒祥主纂《沂州志》的提起

临沂最早的旧志纂修于何年？百度搜索到的内容也是最为权威的说法，是《沂州志》最早成稿于明代嘉靖年间（现已佚失），数十年后，明代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时任沂州知州徐汝冀等人重修《沂州志》。不知多少年过去了，一直延续着这种说法，众口铄金，从无异词。

最近，笔者借阅了由临沂市史志办精心覆刻、宣纸印刷、夹版护封的八本万历旧志。在查阅和探究旧志研究资料时发现，临沂最早“有目无书”的《沂州志》，并非已亡佚的何格主修、王宗性纂的《沂州志》四卷“明嘉靖年间”本，而是约明景泰年间（1457年）沂州训导舒祥主纂的《沂州志》四卷。这两部沂州旧志皆已失传，只留下舒祥、何格的诗赋在天启《沂州志》中。迄今为止，一直沿用何格主修的嘉靖年间志本为最早，舒祥主纂的《沂州志》好像是一个传说，只是“可



信”而已，没有人去深入引证一番。如果通过证引史料证实舒祥曾经主纂过《沂州志》四卷，由可信到确认，临沂旧志纂修时间将被更新，首次修志年限将上推60余年。

舒祥主纂《沂州志》四卷的证明来自于文字史料。第一个是来自于《明史》。《明史·艺文志三》载：“舒祥《沂州志》四卷，李珣《东昌府志》九卷”；第二个是清代黄虞稷撰《千顷堂书目·地理类上》：“舒祥沂州志四卷；何格沂州志四卷”。黄虞稷先生在条目排列顺序的前后上，将舒祥排在何格之前，并非随便而盲目，定是有一定的遵循，约定俗成，前旧后新，即按照《沂州志》的编纂成书年代顺序排列的。由此看来，舒祥主纂《沂州志》的时间早于“明嘉靖年间”是无须怀疑的。第三个是论文资料。2010年前后，宁夏大学人文学院解修丽来临沂进行过一次旧志调查，后来发表了《山东省临沂市旧志考述》一文。其中有一段关于舒祥主纂《沂州志》四卷的话：

“在后志（指《万历沂州志》）中收录了舒祥的十首诗，其中琅琊八景有八首，另外还有《登晒书台》一首和《王祥墓》一首，这十首诗都是对临沂地区风景名胜的描写，这或许至少可以说明舒祥对临沂是比较熟悉的，主持纂修《沂州志》有一定的可信度。”

以上三部书，都提及了舒祥主纂《沂州志》四卷的历史史实，但都没有进行更加深入的挖掘。根据上述的文字记载，笔者利用当前便捷的网络，继续了舒祥与《沂州志》的挖掘和研究。

既然说舒祥主纂《沂州志》四卷早于何格的嘉靖本，就需找到舒祥来沂州的具体年代，而且必须要早于何格任沂州知州的嘉靖年间。由嘉靖初年1522年上推至景泰年间初年1450年，帝王变幻，先后历经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四位帝王的四个年号，时间长达72年。舒祥在沂州工作生活在哪一个年号，不得而知。偶然间搜索到了安徽黄山“云月闲人”的一篇博客文章：《开遍梅花几树春——舒祥》，文中提供了一条宝贵线索：“天顺年间，舒祥调升处州府宣平县教谕，离开了沂州”。天顺是英宗朱祁镇的年号，从1457年至1464年计8年时间。我们知道了舒祥离开沂州的时间，就大约知道了在沂州工作生活的年代，但可惜只是一个孤证。舒祥离开沂州之后做何官职，有何建树，有没有与沂州相联系的历史信息？为了取得更确切的旁证，笔者查阅了黄山市宣平县的资料。

宣平县是个新置县，于明景泰三年即1452年新置，县治在柳城，为古处州的十县之一。1958年撤消县制，大部地域归并入浙江丽水市的武义、丽水两县。据历史记载，此地有修志的传统，早在元朝皇庆年间（1312年）就纂修过《处州路志》；明英宗正统八年（1443），浙江右布政使方廷玉命教授陈昇一对《处州府志》加以修辑。天顺元年（1457），新置的宣平县缺一教谕，沂州训导舒祥或因主纂《沂州志》和大量的诗赋名篇而声名远播，便由沂州训导调升宣平县教谕。据笔者推断，舒祥在离开沂州赴宣平县任职时，随身珍藏了自己所主纂的《沂州志》四卷。在一个适当的机会，将志书呈与宣平县知县何昌委阅读。何知县读后，深深地为舒祥的学识所折服，随即萌生请舒祥编纂《宣平志》之念。

“修史之难，莫过于志。”史修县志为朝廷诏令，是一件皇旨浩荡彰政工程，历代知县皆卑躬谨慎奉令修纂。按照古代的修志特点，修志首先重学识，参与修志人员举人多，进士多；其次重身份，县官、府官多；第三重管理，知人善任，万无一失。宣平县何知县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决定请有主纂志书经验的舒祥纂修。舒祥果不负众望，成书后名为《宣平新志》，这是宣平县历史上首部县志。一位网名为“大明成化年制”的网友在其《明成化处州府志纂修考——兼论

处州府志暨处属各县县志之纂修与流传》一文中有这样文字：

“历时八月于成化甲辰二十年(1484)编纂了《处州府志》凡十八卷，卷十七为《宣平县志》。至民国，宣平县志先后编纂增补九次，出过九个版本。舒祥纂的新志为首志。”

丽水信息港《丽水土》官方网站中，也有著名史学家宋晞所著的《明成化处州府志纂修考》一文：

“邑志之修始于明成化年间，知县何昌委请儒学教谕舒祥纂修之，编为四卷，名曰《宣平新志》。”

总结上述所言，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是舒祥来沂州赴任训导一职年代不可考，但于天顺年间1457—1464年间离开沂州调任宣平是毋庸置疑的。由此可以推断，舒祥主纂《沂州志》四卷的年代在1457年之前的景泰年间（1450—1457年），或者更早的正统年间。二是从舒祥离任来到宣平县之后，知县的信任，首部宣平县新志的圆满完成，这与曾经的成功实践有着相当大的关系。因此，沂州主纂《沂州志》四卷的是完全可信的。

沂州训导舒祥是河南新安人还是安徽黄山人？

舒祥的生平不详，籍贯也众说不一。历史留给我们的资料只有一条线索：《（万历）沂州志》卷十中《沂州赋》的署名“新安舒祥撰”。新安是今天的哪里？在临沂目前可以看到的文字资料中，凡涉及舒祥籍贯的皆众口一词：河南新安人。

首先，临沂史志学界前辈李兴河先生曾撰写过一篇文章，名曰《美景动诗灵，好诗留美景》，文中说：“舒祥河南新安人，生平不详。八首诗写于何时，也无诗料可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八首诗是他在春天游览了八景之后写成的。”

其次，黄忠、韩忠勤编著的《沂蒙大观》一书第九十章《琅琊八景》第一节“泥沱月色”中，有“明朝河南新安人舒祥在他的《琅琊八景》诗中写道”的介绍，也认定舒祥为河南人。

第三，宁夏大学人文学院解修丽也持此说，他在《山东省临沂市旧志考述》一文中，也认为舒祥是河南人。

百度搜索舒祥籍贯结果，也多采河南新安之说。特别是临沂市罗庄区在旅游景观的开发建设中，屡屡引用舒祥的《琅琊八景》诗，皆说是河南新安人。

无独有偶，还有另一说：舒祥为安徽黄山人。安徽师范大学“云月闲人”在《开遍梅花几树春——舒祥》一文中说“舒祥为今黄山市黟县屏山村人”。此说引起了笔者的兴趣，寻此路径一路百度搜索到了今黄山市史志办官方网站。家乡人说家乡的历史文化人物，资料丰富，颇为详细，舒祥为安徽黄山人的说法更为可信。

新安作为一个县级地名，在全国范围内有河南、广东、河北、山西等省皆有新安县。笔者首先查找了河南洛阳以西的新安县，发现在当地历史名人中，鲜见有与舒祥有关的信息。为了找到舒祥是安徽黄山市新安的证据，百度搜索黄山市黟县历史概况发现，在今安徽黄山市境内有一条新安河，被黄山人民称之为母亲河，如同临沂市之沂河，因近此河而得其名，新安郡地名的由来也是因新安河而有其称。西晋太康元年（280）设新安郡，隋开皇十一年置歙州，大业三年又复为新安郡，之后历代有歙州、徽州、徽州府。1983年12月1日设立黄山市（县级



屏山村街景

市），由省直辖，1987年11月27日撤销徽州地区设立黄山市（地级）。黄山市现存《新安志》一部，作者为罗愿。

就像临沂被称为古琅琊一样，新安作为一个地名现已不复存在，但作为一个雅称、古称，如临沂之古琅邪仍然为今黄山人所称道。黄山市地方志办公室官方网站的栏目设置，现在仍设“新安史话”栏目，以研究新安的历史为主旨。2013年12月，黄山市地方志办公室和地方志学会主办了一本杂志，起名曰《新安》，有如临沂市志方史志办公室编辑出版的《沂蒙史志》。在办刊总旨上赫然写着：“抢救保存古新安（徽州）文化记忆，记录当代黄山各项事业发展历程。”在《新安》杂志发刊词中，“新安”屡屡提及，可见在黄山人民中的厚重：

“一千七百多年前，西晋太康元年（280），晋武帝司马炎灭吴统一中国，改新都郡为新安郡。从此，我们这片土地拥有了这个和谐美好的名字——新安。此后，唐武德四年（621）改新安郡为歙州，宋宣和三年（1121）又改歙州为徽州，但“新安”作为雅称、古称，一直为人们所称道。梁武帝曾发出“新安大好山水”的赞誉，朱熹亲笔题写这六个大字并镌刻于歙县长陔的崖壁之上，后世文人雅士皆以自署“新安某某”为荣，以“新安”冠名的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等文化学术流派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深远、地位显著。而我们的母亲河——新安江，更以其宽厚、温润的胸怀，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新安儿女，催生和滋润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新安文化……”

今天，我们翻开旧志再看《沂州赋》的署名“新安舒祥撰”，就可以想见当年舒祥在写就《沂州赋》时，郑重地在名字前署上“新安”二字时的豪迈之情。

笔者又查阅了黄山市有关市县的大量历史资料，得出如下结论：舒祥，字维祯，明代著名诗人，今黄山市黟县屏山村人。屏山村位于黄山市黟县县城东北约4千米的屏风山和吉阳山的山麓。属于典型的江南水乡村落。屏山村自唐朝则聚居舒姓，故屏山村又名舒村，至今已有1100多年历史。历史上的屏山村舒姓名人辈出，是著名人民表演艺术家舒绣文的故乡，成功主演过《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影片。现在，屏山村现已成为黄山市有名的旅游景区，引得大学生前来写生，在写生报告中，对舒村及舒祥的诗句多有引用。

舒祥主纂《沂州志》有无可能？

说舒祥于明景泰年间主纂《沂州志》四卷，在临沂来说还是一个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新发现，此处之新是缺少舒祥主纂的旁证资料，哪怕是蛛丝马迹。在以科举取仕的明代，舒祥主纂志书需要有科举的文化、书香门第的家学作为奠基。还要有相对应的官职、卓越的文化贡献。这些信息都是我们判断能否主纂一部县志的硬条件。这些谜一般的问题，在临沂研究史料极少而又特别重要的情况下，只能逐步剔抉繁杂，摄取其真。

前面我们说到，舒祥的家乡是黄山市黟县屏山村。此村素来重视教育，文风极盛。在这块风水宝地的孕育下，屏山村由科举而中进士的相当多。据资料，自宋至清有舒介夫、舒升中、舒彦中、舒夷中、舒宾王、舒擢、舒叔宝、舒荣都、舒崇功、舒斯笏等人，至于中举人的更多。近代，还出了一位杰出艺术表演家舒绣文，曾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为国家一级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会委员。在黄山市史志办网站“文化英才”栏目中，看到了这样一条重要的文字：

“舒祥：明朝诗人，任浙江宣平教谕，善文词，著有《窃芳集》，其咏《石鼓山》有句云：‘云过半山看有影，泉流深树听无声’，意境幽远而对仗工整。”

舒祥家乡文化明星熠熠生辉，虽然没有确切的资料说舒祥是“科举入仕”，却确切记载是“文化英才”，中举之人可以学富五车，未必是历史留名的“文化英才”。以据旧志记载，明代的训导一职，多由监生担任，不管舒祥是因科举而入仕，还是以监生、贤良方正奉发来沂，担任沂州训导一职是有明确文字记载的，任职时间只能推断为约在明正统（1435—1450）或者景泰年间（1450—1456年）。

训导一职，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官员，主要负责考察本地区秀才的功课成绩及教育。按照《明史·职官志四》：“儒学：府，教授一人，训导四人。州，学正一人，训导三人。县，教谕一人，训导二人。教授、学正、教谕，掌教诲所属生员，训导佐之。”当时的沂州归兖州府管辖，大于县小于府，领现在临沂市的郯城、费县，故设学正一人，训导三人，舒祥是三训导之一。《（万历）沂州志》在“纂修姓氏”有“儒学署学正事举人孙枝衍，训导康世亨、李应暘、王皋（校阅）”的记载，足可以印证。作为一名教育局的官员，又主管沂州秀才的功课及成绩教育，由自己主纂、聘请诸位秀才共同完成《沂州志》的纂修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翻阅其他县市的旧志，由州县的训导来撰修县志州志的不乏其例。

舒祥离开沂州升任浙江处州宣平县教谕后，不仅有诗文存世，至今传颂，而且又有一次纂修县志的经历，成为他曾经主纂《沂州志》的一个重要旁证。安徽黄山人“云月闲人”在《开遍梅花几树春——舒祥》中说：

“天顺年间（1457年），舒祥调升处州府宣平县教谕，离开了沂州。宣平县，旧为丽水县北之宣慈、应和、懿德三乡，明景泰三年析置为县。明成化年间，教谕舒祥受知县何昌委请纂修《宣平新志》四卷，成为宣平县历史上首部县志。”

浙江省文物局官方网站《浙江文物》之电子刊物2013年第六期鲍仕才撰写的《宣处古道追忆》：

“明天顺年间（1461—1470），安徽黟县人舒祥任宣平县教谕期间，在游石门

岭后写下一首七言古风长诗，将石门之险、步岭之艰、山水之美、山民之逸、宦宦之德、离任之情全寄托其中，可谓描写石门岭最全面的一首长诗。”

浙江更香有机茶业开发有限公司俞学文在《武义茶饮养生文化的历史溯源与未来展望》一文中说：

“明朝天顺年间任宣平教谕（县治在柳城镇）的舒祥寻访叶法善当年住过的冲真观（又称宣阳观）诗句中可以得到印证：“烟边茶灶留宾语，月下云篇伴鹤看。一着残棋萧散后，无端清思好凭栏。”

《明代方志考·浙江省》载：明嘉靖二十五年《宣平县志》条云：“成化二十年教谕舒祥，创修《宣平县志》四卷，此志继《舒志》重纂，其书分三十一门，无大纲，总括邑事皆备，体例简核，纪建县事甚详。”

以上四篇文献证明，舒祥于1457年前后离开沂州，到今浙江丽水市的宣平县担任教谕，一如既往，如在沂州，在饱览了当地山水名胜之后，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出版了文集《窃芳集》，颇负盛名，至今还被人们所传颂。又于1485年（成化二十年）主纂了《宣平县志》四卷。联系到舒祥在沂州工作期间也写了《沂州赋》《琅琊八景》《登晒书台》《王祥墓》等诗赋，完全可以证明舒祥有其主纂《沂州志》的条件和能力。而且训导主管秀才的功课事宜，有着人才和知识的优势，可以说舒祥主纂《沂州志》四卷是可信的，也是可能的。

舒祥在沂州期间的文化成就

舒祥在沂州生活工作的时间里，走遍了沂州的山山水水，饱览了沂蒙的丽山秀水，激发了诗人的创作灵感，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沂蒙山的如画风景，让他醉入春风，进入陶醉的美好境界。由此及彼，让舒祥想到了家乡黄山的秀美，屏山村的幽静，暂时忘却了乡愁，把沂州当成了故乡。他在做好“掌文庙祭祀，教育所属生员”的工作之余，用手中的笔写下了大量的诗赋，为沂州文化事业的发展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总结起来，舒祥除了为沂州留下了一部四卷《沂州志》外，还有两个方面的文化贡献：

一是创作了《琅琊八景》诗及《登晒书台》《王祥墓》诗。琅琊八景之“泥沱月色”，从今天的遗址来看，处于罗庄区罗庄街道办事处湖西崖、湖南崖、八块石、三村范围；“普照夕阳”系临沂城王羲之故居北侧，新建设的普照寺大雄宝殿内复原了这一胜迹；“孝河凝冰”在兰山区白沙埠镇；“苍山叠翠”在临沭县夏庄、韩村、朱苍三镇之间，方圆近100千米；“平野晓霁”在临沂城沂州路北首鼓楼台巷，平野台之古井碑今尚存；“沂水拖蓝”在临沂城东，是沂河、沭河、涑河三河交汇后，形成的清浊分明的水流；“野馆汤泉”在今临沂城北河东区汤头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神峰积雪”在苍山县尚岩镇境内，因为文峰山北面积雪四季不消而成的胜景。说得这么详细的目的，是想说明当时的沂州是不辖今日的蒙阴、沂水诸地，万历年间的沂州只领辖郯城、费县两县。此八景所处的地域，八景中有七景分布在沂州城四周，距离最远的“神峰积雪”一景，虽远在今今天的兰陵县，但在辖区内的沂州费县也可以领略到神峰之积雪之美。舒祥赴费县公务时可以遥望或履及而一饱眼福，有感而发，完成了优美的诗篇。舒祥用七言律诗的形式生动描绘了此八处胜景，堪为优秀佳作，至今仍在沂蒙人民口中传诵。在当今临沂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建设中，各级政府每每编写涉及沂蒙优美风光的篇章中，仍被频频引用，成为旅游文化中古琅琊风景的恢复和开发，以及特色定位上的重要依据。

二是为沂州大好山水和秀美风光所倾倒，写下了著名的文赋《沂州赋》。据推测，舒祥在主纂的《沂州志》四卷中就将这篇《沂州赋》纳录其中，后人在编纂嘉靖、万历、天启重修志本中，也作为珍贵资料收入艺文篇中。万历志本还收录了蒙阴公籍的《东蒙山赋》，使这两篇歌颂沂州和蒙山的文赋得以流传至今。由此也可见此赋在明代志书编纂者心目中的地位。

在古琅邪临沂，用“文赋”这种半诗半文性质的独立文体来歌颂沂州之美的作品不能说没有但不多见。沂州训导舒祥创作于400年前的这篇《沂州赋》，在百度上搜索中寥无踪影，何谈解读、详注、追捧之文？由此可知，在临沂市史志办覆刻《（万历）沂州志》之前，《沂州赋》这篇歌颂大美新临沂的名篇已淡出人们视野，被历史的烟尘所湮没。今天我们有幸读到《（万历）沂州志》中的这篇名赋，列为优秀佳作之榜当无悬念。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这篇《沂州赋》还安睡在美国教会图书馆的时候，在舒祥的家乡黄山市的舒家族人中还流传着《沂州赋》传抄本！据笔者推断，此传抄本不是源自于舒祥所著的《窃芳集》，因为《窃芳集》是一本纯诗集；就像钱钟书先生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只收散文不曾收诗，故这篇歌颂遥远他乡沂州的赋就没有收入其中。他的族人定是由舒祥从沂州带去的《沂州志》中读到了这篇《沂州赋》佳作，版本珍贵，刻本太少，只有一部或者几部，于是就有了手抄本《沂州赋》在黄山族人中的流传。从流传的版本与临沂的重印本相较，完全可以肯定，这本手抄之赋不会源自于国家图书馆方志馆第二文献阅览室的缩微胶片，或者临沂市史志办覆刻的限量版《（万历）沂州志》。

安徽黄山舒家族人传抄本《沂州赋》的发现有一段曲折故事。笔者在百度《沂州赋》时，找到了“云月闲人”发表于2015年3月24日博客的《沂州赋》全文。2016年《（万历）沂州志》覆刻本在临沂的诞生，《沂州赋》也一同重现。

读舒祥的《沂州赋》，优美的字词、大美新的风景、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不断冲击和刷新着我们大脑中的文学收藏空间。美不胜收，爱不释手之感，油然而生。“不得以专美于前兮，尤得以启发于后人。愿后人之传流不息兮，使后人又法于后人”，舒祥先生在赋的最后写下了这样的话。

这是美好的预言，也是对沂州的祝福。

丹青为人民，笔墨随时代 (六)

——记著名画家皮之先

刘瑞轩

书画紧系两岸情谊

1992年4月，正当春暖花开之际，之先忽然接到一封来自台湾的信。他感到很诧异，自己在台湾没有亲友，这信从何而来呢？他打开信封一看，原来是大台中美术会发来的邀请函，请他提供大作，参加在台中市举办的“92两岸美术观摩展览”。信的末尾署名是黄荣辉，这又是何许人也？

黄荣辉，1949年生于台湾澎湖。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1983年留学美国，入新泽西州彼得逊大学攻读硕士，主修绘画造型设计，毕业后任教于台中市台中技术学院。曾游历欧洲、亚洲、中国大陆、美国各地，并应美国中国国画馆邀请赴美国举办个人画展。他专攻中国山水皴法与油画，透过自创的皴法，再渗入几何色块的阴影，形成立体派的山水画。传略收入《世界华人美术名家年鉴》《台湾艺术家年鉴》。曾任大台中美术会会长、台湾省美术工作者协会理事长。

20世纪80年代，黄荣辉去美国留学，因爱好美术，经常到纽约中国城书店和画廊参观，有幸看到中国大陆各地的美术作品。这些作品内容丰富多彩，风格多样，呈现出不同的画风趣味，充分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些都让他陶醉，流连忘返。

稍后，随着海峡两岸的通航、开放探亲，黄先生能够亲临大陆各地拜访亲友、游览、写生，尤其是可以向大陆的名家请教，不仅受益匪浅，也饱了欣赏名作之眼福。由此他萌生一个宏愿：将大陆名家之作引到台湾展览，让更多的台湾人看到这些难得一见的佳作。于是，他发起、策划，由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会主办，邀请大陆各省市画院及各大院校美术系的教授及其他知名美术家提供精品，与大台中美术会会员作品一起展览。为了征集作品更加全面、广泛，黄先生还请广西的画友黄久湖帮助联络、征集。皮之先时任临沂画院院长，能收到邀请函就不足为怪了。

之先虽未去过宝岛台湾，但他向往台湾。他认为参加在台湾的展览，是难得的

好机会，通过自己的作品能为沟通两岸的桥梁增添一砖一石，是值得庆幸的事。因此，他精心绘制一幅山水中堂《蓬莱仙阁》寄往台湾台中市。

经过两个多月的征稿和前期准备工作，“两岸美术观摩展”于7月25日在台中市立文化中心隆重开展。参展作品达900件，内容有中国画、油画、水彩、版画、书法、篆刻等项，参加的作品不仅有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也有新疆、西藏、内蒙、海南等边远地区的。

从参展的作品看，大陆的作品比较看重地方特色和个人风格，下面仅就掌握的资料略举一二：

广西黄久湖的《花与风景》（中堂），是花卉与山水结合的创新之作。右下方为红花、赭叶的南方花树，色彩浓重；左上方为浅绛山峰，下面是映有山峰倒影之江水，点缀两三只渔舟，色彩均极浅淡。

甘肃李伟的山水《黄土情》（中堂），画的是西北高原上的三口窑洞，洞口坪台上有农夫赶毛驴，农妇在晒粮食。通幅有浓郁的黄土高原的气息。

台湾的作品占一少半，这里介绍几位有代表性的书画家：

胡念祖（1927-），湖南益阳人，台湾师大毕业。为山水画大家黄君璧的正传弟子，可谓最得真髓者。曾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赴美，接触不少抽象派画风，在其画作的构图、笔法上加入了抽象的元素。如《云壑飞泉》，既有黄先生的面目，又有自己的独创。

欧豪年（1935-），广东人，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美术系主任。擅人物画，1987年作《钟馗》形神兼备。曾在美国、日本、英国等地举行个人展，获台湾中国画学会颁赠之金爵奖。

陈进（1907-），女，生于台湾新竹县。在台北中山女中就学期间，获得日籍画家的赏识，后考入东京女子美术学校，学习胶彩画创作。曾旅居美国，晚年又回台湾。她的画以“我见，我思，我画”的方式反映生活。晚年以亲情为题材的画作较多，如《母与子》《母爱》等，表现出赤子童心的情怀，表现崇尚生命的纯粹性。从技法上看，所应用的描线法、重叠法、清水法、胶墨法等，层层相扣，比之西洋画之技法，难度超出好多倍。

汪兆中（1931-），安徽人，台湾政治大学艺术系毕业，韩国檀园大学荣誉文学博士。曾任教于台湾文化大学、复兴岗大学，任国立艺专美术科教授。擅国画人物。所作《八仙图》，造型简括，神态各异，栩栩如生。

这次规模盛大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轰动了台中市。一位台湾老画家动情地说：“我和大陆的老朋友未能相聚，而书画已经相聚在一起了。愿我和他们早日能见面。”展览中还有一个小插曲令人感动。一位气质文雅的老太太，由孙女陪伴着一连三天到美术馆参观。她看得认真仔细，还不时在画的面前与孙女讲说一番。原来老人是一位美术工作者，展出作品作者中有不少是她早年的同学、好友，已有40多年未通音讯，今天看到他们的作品，睹物思人，心中难以平静，总想多看几遍。老人激动地说：“不知道我的同窗好友还记得我不？这次带孙女来，就是要告诉她，如果今世不能和他们相会，将来有机会看到他们时，一定要向海峡对岸的朋友们问候，告诉他们，台湾的同窗好友没有忘记他们！”说着说着，老人的声音哽咽了，眼中饱含泪水，多么感人的离别之情啊！

展览结束不久，之先又接到黄荣辉先生一封言辞文雅、客气的信：

大师勋鉴：

92年两岸美术观摩展览，已盛大圆满举行，同时出版彩色画册，获得各界好评。为感谢大师的盛意惠赐精品大作，除入编画册，又将贵作品印制成了数百张卡



片赠送，略表薄忱。随函奉上一部分，尚有部分卡片与画册均于8月底运达广州黄埔港……正在广州托人发送中，谅于近期可奉上，敬请查收。

日后仍期大师随时赐教，也欢迎来台指教。

专此致意，并候

大吉利！

晚辈 黄荣辉 顿首

遗憾的是，之先因故未能前去台湾，躬逢其盛。

“两岸美术观摩展”后，又举办了两岸美术交流学术研讨会，两岸艺术家各有六位重量级的学者发言，议题有两个：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缘于两岸因意识形态不同所导致立场殊异，首场的“美术创作之探讨”即引发了冲突。其争论的焦点有二：一是中国画的名称问题，不管是传统惯用的“国画”也好，或是近代所称的“水墨”，以及林伯亭所主张的“彩墨”，刘国松所提出的“墨彩”等，这些只是名相的问题，毕竟他们的内容都是一致的，名称能否统一，只待时间的融铸，倒不致于造成太大的冲突。焦点之二，是所谓的“文化角色”问题，成了研讨会火力集中的标的。大陆的两位学者发言，给人以“中原文化为正统”的感觉，而台湾学者发言，则强调了属于台湾地域性的美术特色。尤其是一位陆女士的发言，指出多元文化发展的世界性趋势，与台湾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所发展出的“新地方主义”之重要性。双方也各自阐述了美术创作发展的脉络，可谓各有各的立场与观察视角。虽然与会者都是台湾本地的美术界人士，但发言者却也分为明显的两种主场：一边拥护“中原文化传统”，另一边则强调“台湾地域特色”，俨然有壁垒分明的态



势，而给人以各说各话的感觉。

在第二场的“美术教育之研究”研讨过程中，大陆学者眼中的“美术教育”指的是所谓“正规”的、“学院”系统的教育，也是一般人所认为的专为培养“创造人才”所办的教育。而在台湾学者方面，一位郭女士发言则偏重于中小学生的基础生活中“视觉教育”的探讨。在这方面两岸学者的观点截然不同，毫无交集可言。

因为两岸相隔40余年，而研讨会又时间短暂，双方观点要到达统一，是不现实的。不过两岸学者都认识到，若能基于文化同源的共识，捐弃各自的本位主义立场，相信差异会在尔后的交流中逐渐减弱。我们期待未来两岸美术界，甚至文化界能日渐走向“多元共融”和谐相处的境界。

1995年4月，之先又接到台湾台北市的征稿函，邀他参加在台北市立社会教育馆举办的“海峡两岸艺术交流展”。之先精心绘出人物中堂《羲之笼鹅图》，寄往台北市。举办方还邀请他前去参加开幕式。随着两岸交流越来越密切，两岸画家作品联展逐渐成为常态化，之先为两岸的艺术交流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父亲穆林主动请缨下派临沂

曾经并不遥远

1957年春至1959年春，父亲穆林以省委常委的职务下派临沂挂职地委常委、临沂县委第一书记。

父亲下派期间，除日常工作外，做了几件“大事”，如今回忆起来，教人颇有感触：一是在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期，部分农户要求退社，父亲拍板允许；二是沂河洪水，国家防总（抗旱防汛总指挥部）、省防总已下达命令炸坝分洪，父亲没有执行，最终化险为夷；三是在反右斗争中，没打一个右派，在当时的形势下，堪称“一绝”；四是在大跃进时期，不搞浮夸……更令人称奇的是，父亲如此“抗命不遵”，最终又都得到了省委乃至中央的首肯……

一、主动请缨

1956年底至1957年初，时任省委常委、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的父亲带工作组赴烟台、潍坊、临沂地区调研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所到之处，部分已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要求退社的情况引起了父亲的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山东省广大农村逐步完成了土地改革，广大无地和少地的农户分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但仅仅过了几年，就出现了贫富分化的新情况，有的农户因贫病、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开始出卖在土改中分到的土地，有的农户开始购买土地，因而出现了新的富农，土改后消灭了的雇工剥削现象重新出现。显然，对这种现象若置之不理，广大农村很快就会倒退到解放前的状况。

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开始办起互助组，继而又开始办起农业生产合作社，

实行了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

这本是一件显而易见的好事，一是可以防止出现新的地主富农和贫雇农，二是有利于实现农业的水利化、机械化等等，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力。

既然农业集体化的好处多多，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部分农户闹退社的现象呢？而且有的地方弄得很紧张，干群之间、群众之间（拥护合作化的群众和要求退社的群众之间）矛盾相当突出。

调研中，许多干部群众谈了看法：有的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必须给予坚决的打击；有的认为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绝不能姑息迁就；还有的认为这是先进与落后的矛盾，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落后；也有干部群众感觉看不清、拿不准，不好下结论，不知该如何处理。

父亲感到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但下去的时间短，又不可能彻底搞清楚，就有心再找机会深入下去。

正在此时，中央发出领导干部到基层挂职的号召。父亲主动找到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舒同同志要求下派挂职。

舒同说，省委已打算叫我父亲担任省委秘书长一职，叫我父亲再认真考虑一下下去挂职的事。

父亲说，他更希望下去挂职，当前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都遇到很多新问题，他很想下去搞清楚，多做些实际工作……

舒同想了一下，说，你想到哪里去？

父亲说，从现在的情况看，临沂的问题最严重，我就到临沂去吧……

舒同说，好吧，接着他又说，下去工作条件差一些，你把车也带下去吧，回省里开会也方便些……

父亲说，一个县的范围能有多大，两条腿跑就行了，省委的车也不多，还是给其他同志用吧……

舒同说，我们别争了，你的腿上还有伤……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腿部负过伤，伤好后，一直走路不是很得劲。

父亲先到临沂地委报到。地委书记朱奇民对我父亲说，你不能光呆在县里，地委的事你也要操心啊……

当时临沂地委机关只有一辆车，父亲就把车留到了地委。

临沂县委机关没有车，父亲下乡时，秘书张延英同志骑一辆自行车，父亲不会骑自行车（腿不好），就由警卫员韩继文同志骑自行车带着他……

就这样，父亲开始了他下派挂职的工作生活。

父亲在临沂挂职两年，在县委、地委工作的时间大约各占一半。

二、允许退社

当时山东各地农村的退社风波以临沂地区最为严重，临沂县尤为严重。

临沂县群众闹退社始于1956年春夏，至1957年春达到高潮。从4月开始，全县1300余处农业合作社中，有179个出现了闹退社风波。茶山乡有十余处合作社发生问题，群众抢走合作社的牲畜169头，种子6.5万多斤，地瓜5万多斤，大小农具2700多件，牛料1300多斤，牛草15万斤。无梁殿村部分群众闹退社，同住村区干部和100多位民兵发生冲突，打伤50余人。梅家埠村100多户社员要求退社，区乡驻村干部召开群众大会，当场绑了5名社员，高呼“坚决干社会主义”等口号，鼓励集体盟誓，想以这种方法制止退社。太平区的区长到刘黑墩村处理问题，支持区长和反对区长的



穆林同志在临沂地区莒县龙山修筑鱼鳞坑的情形

两派群众打架，误伤1人。部分群众把区长捆起来，拉到河边以假枪毙相威胁。

有的基层干部坚决要求抓一批闹事分子，镇压一下邪气，否则就要交扁担不干了。

父亲到县委任职后，第一件工作便是处理这一问题。父亲先到有代表性的几个合作社转了一遍，基本掌握了部分群众闹退社的状况和原因：一是许多合作社是一哄而起、“一步登天”建立起来的，违背了群众自愿的原则；二是合作社建起来后，未能认真地做好完善工作，一村一社的规模太大，无法进行正常生产和合理分配，因而导致1956年秋季有些合作社收成减少，社员生活受到影响；三是部分干部对办高级农业社缺乏思想准备，更无管理经验，工作跟不上；四是有的干部作风不端正、不发扬民主、不公开账目、不参加劳动等等。父亲认为当时群众闹退社，不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也不是两条道路斗争，是人民内部矛盾。

当时县委一班人和许多干部的思想认识并不一致，大多数人主张采取制止的办法，哪里出了问题就到哪里处理，唯恐一旦允许退社就会造成合作社的瘫痪甚至垮台，无法向上级交代。

父亲有些幽默地对同志们说，不要把问题看得那么严重，大家不妨提上一壶茶，买上一包烟，和闹事的群众坐下来，喝着茶吸着烟，平心静气地谈一谈，讲一讲农业走集体化道路的好处，话讲清楚了，能不退社当然好，坚持退社的，就要坚决按“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办法办，这是合作社章程里规定的，我们不能说话不算话……

在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县委派出10名县级干部任区委书记，23名区级干部任乡党总支部书记，并要求进村的干部一定要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坚决做到：1.采取耐心说服的办法解决群众闹退社问题；2.贯彻“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方针，退社群众可以带走入社时的土地和农具，农具已无法带走的，要作价退还；3.适当调整合作社规模，一般以百户左右为一个社；4.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允许社员有自留地、场院，房前屋后的树木归个人所有，社员可以饲养猪、羊、鸡等家畜禽，可以搞家庭副业等；5.提高合作社经营管理水平，贯彻民主办社、勤俭办社方针，干部带头劳动，推行“三包”（包工、包产、包财务）、“五



上世纪八十年代
穆林与老乡交谈

定”（固定生产队规模、生产区范围、土地等级、牲畜、农具等），促使合作社组织不断规范化。

经过大约一个多月的的工作，合作社的困难逐步得到解决，闹退社风潮平息了，合作社的阵脚稳住了。又经过一个时期的工作，合作社管理水平提高了，生产上去了，全县退社的7277户群众中又有6575户重新入社，另外还新吸收3434户群众入社。

当时临沂地委书记朱奇民同志对允许闹退社的群众退社有顾虑，怕刮起退社风不好收拾，一时下不了决心。我父亲对他说，“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是中央决议里写的，也是合作社章程中规定的，还是这样办吧……根据我父亲的意见，临沂地委决定：在做好工作的条件下，坚持入社自愿、退社自由；退了社的群众，什么时候想清楚了，欢迎重新入社……从而满足了部分群众的退社愿望，赢得了群众的拥护。临沂地区共有1万多农户退社。

事后，朱奇民同志向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同志作了汇报，舒同又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肯定了临沂的做法，他老人家说：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不愿在社的让他退嘛，不过百分之一……

民主人士邵立均 力推“两孩化”国策

宋继民

2017年元月，我省有关部门通过社会调查摸底统计，估算二孩出生量将超过一孩，山东全面二孩政策释放的意愿还要持续多年。

从“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来，山东省2016年前5个月已受理单独二孩再生育申请22.3万份，占到全国的四分之一，被称为“最敢生”的省份。而2016年“全面二孩”实施以来，山东积累多年的生本能意愿也被瞬间点燃。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始于上世纪80年代。1980年9月，党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宣布“全面放开二孩”，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我不禁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初采访原莒县政协常委、民主人士邵立均的往事。当时，他就是通过科学计算，倡导“两孩化”国策。

1981年9月，时任大众日报记者的我去莒县（当时还属临沂地区）采访，时值全国普遍推行“一孩化”计划生育政策的热火朝天阶段。在这个县城里，随处可见张贴的标语口号。“能引的引出来，能流的流出来，坚决不能生下来”，“男结贫穷的扎，女上致富的环”，“要想富少生孩子多栽树”等等。在这样的形势下，还有一位耄耋老人正在日夜推算“两孩制”的必要性。他叫邵立均，时年已81岁了。

笔者与邵立均相见，是在莒县招待所。在我到该县的第二天早饭后，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在县委宣传部同志的陪同下敲开了我的房间。一阵问候后，他递给我两张1980年8月版油印的关于建议推行“二孩化”的人口测算表（见下页）。我为老人端上杯茶水，听他细谈原由。他的主要观点是：两孩制是国家当前首要推行的措施，“一孩化”政策不利于国计民生。他以跨世纪12亿人口上限为差数，分别年代死亡率，新生累计数、平均结存数、年代应有数等类别，推算出合理的人口增长率。他建议最好能在全国五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作出推行“二孩制”的计划生育法规。他对我说，一对夫妇一对孩既顺应育龄夫妇的意愿，也能保持人口结构的良好平衡。他建议，应修改婚姻法和刑法有关条文，以起到配合作用。如能在一孩制试行三年以后，即行改正过来最好。那就是经过三年以来的新措施，使群众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加强，多胎生育使人口



明代泾王与费县王林

二月春风



王林村，位于费县薛庄镇东5.7千米的云台崮脚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王林村后山上有个大土堆，当地人很早就知道是个古墓，因为地表没有碑碣，不知墓主为谁，也不知道里面什么样。光绪《费县志》仅把此墓作为无考古墓列在《邱墓》附录之中：“云台崮前古墓，墓高数丈，周数十武，墓前有石门、寝殿及配廊，皆黄绿瓷瓦，今已无，俗传为鲁王墓，无碑碣可考。”

古代人选择墓地讲求前有照山，近有案山，后有靠山。王林村位于蒙山山前，村北是靠山，南有照山，东为龙山，西为虎山，群众称为“北靠南照，东龙西虎”，从风水学上讲，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

王妃墓实为王爷陵

1966年春天，王林墓被打开。从现场遗迹看，古墓曾被掘过，墓门一扇关闭，一扇半掩，墓中只有一倒地的石香炉和一块墓碑。后来，考古工作者对王林墓进行了认真

的调查，发现墓呈正方形，东西长12米，南北宽12米。砖石混构墓，由前室、后二室、左耳室构成。墓门、门楣系石灰岩，砖室券顶，墓壁用朱彩涂饰。墓葬早年被盗，“文革”期间又被掘开，随葬物被盗掘一空，仅存圆雕石虎一只，墓志一方，铭为“曹氏墓妃”，墓志大意为曹氏因偶得一梦，梦见蒙山前有好地方，言死后葬于此地。曹氏死后葬于此地。墓上建有亭殿之类的建筑，并派兵看守。现墓室保存完整。1981年被费县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王林明代墓

陵墓打开后，墓主人身份得到明确，就是明朝泾王的王妃曹氏。泾王即朱祐橚，明宪宗第十二子，弘治四年（1491年）受其兄明孝宗之封为泾王，封地在山东布政司兖州府沂州。弘治十五年（1502），泾王就国，其王府在今临沂城考棚街西巷。

村民翟兴锋、翟正新介绍说，三个墓室，中间的最大，两边的稍小，曹妃在东面的墓室内，里面有一个石棺。由此来看，当时这个陵墓不单单是为曹妃所建，应该是泾王为他自己和两位王妃准备的。中间的墓室应该属于泾王，而两边的墓室则是他的两个王妃。除了曹妃，泾王还有一位魏妃。

王爷坟严格的称呼叫园寝，“园寝”一词最早见之于《后汉书》，最初的含意是指帝王的墓葬，包括“园陵”与“寝庙”两个部分。如生前的居所，前面制庙，后面制寝。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礼制最为完善的时代，除帝陵外，对皇亲贵戚生前死后的等级规定非常严格。正统十三年曾钦定：亲王莹地五十亩，房十五间。在洪武三年（1370年）还曾颁布了坟莹之制，从莹府之周、坟高、石像生数量等都有详细、严格的规定。

王林村老人回忆，陵墓应该还有个院子，从院墙遗存的地下部分看，有两米多宽，还有北马道、南马道，村南有个叫“南城子”的地方，传说是操练兵马的地方。后来，村民在这里还挖出一口古井，直径两米多宽，上面用石头砌成圆形，可能就是护林卫兵的饮用水源。村里还有很多绿色瓦片，一敲当当响，是陵墓附属建筑的瓦片，传说这些砖瓦都是产自淄博的，用一人传一人的方法传过来。不知什么时候，陵墓的地上建筑被彻底破坏，只留下这些碎瓦片，被孩子用来做打瓦游戏玩。

就藩沂州

泾王朱祐橚是明宪宗之子、孝宗之弟，生于成化二十一年，弘治四年封为泾王。弘治十三年与东城兵马指挥曹铉之女成婚。成婚之日，明孝宗亲自主持婚礼，泾王夫妇接受群臣朝贺，整个婚礼过程与皇太子无异。弘治十五年，泾王前往他的封地沂州（今山东临沂），王妃同往。

朱元璋死后，他的四子、燕王朱棣凭借雄厚的实力起兵夺取皇位，他以亲王的身份夺得天下，深知亲王拥有重兵必将威胁中央政权。于是，他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剥夺亲王的军政权力。此后，历代皇帝继续执行这一政策，亲王们不但军政权力被剥夺得一干二净，连人身自由也受到极大限制。明代中后期的亲王，在某些方面连个普通老百姓也不如。王府所在的城市就是亲王的一个大监狱。没有朝廷的许可，亲王连出城扫墓都不行。亲王虽然在政治上没有了权力，但经济上的待遇却非



常丰厚。在亲王之国就藩时，皇帝经常会赏赐大片的土地。

泾王来到沂州后，做了不少善事。兴修水利，导涑入城，今罗庄区宝泉寺里，记载着泾王关心人民疾苦的功绩。泾王还经常捐资重修寺庙，除宝泉寺外，还有东岳行宫、费县岐山寺、城头寺等。特别是费县城头寺，现存两通明代石碑，阴阳四面碑文《重修福胜院记》《鼎建圣像之碑》《万古流芳碑》《泾府殿下碑》，均与泾王与王妃出资重修寺庙有关。

魂归北京城

嘉靖九年，47岁的泾王妃去世，葬于“山东沂州蒙山”，即王林村后蒙山。七年以后，泾王去世。嘉靖皇帝命工部在北京西山为泾王建坟，并赐谥号为“简”，史称泾简王。

明代藩王未经特许不得进京，但封王就藩，死后无子，封国取消，得到许可就能回京安葬。泾王的灵柩从山东运至京西，同时还有曹妃的灵柩，泾王夫妇合葬在一起。王林古墓打开后没有什么发现，是因为这里就是空墓，后又进行密封。半掩的墓门，倒地的石香炉、石碑，估计还是盗墓者所为。

北京西山著名风景区八大处，有个自然村叫金王府。此村就是因葬明代的泾王而得名。明代沈榜的《宛署杂记》记载泾简王、妃曹氏葬于金山。从《大明泾简王妃圹志》可知，前往京西参加祭祀活动的人员有皇太后、皇后、公主，规格非常高。

泾王的另一位王妃魏妃，嘉靖皇帝也安排得很好，在北京建泾王府，使其颐养天年。北京八大处公园《新建大悲殿碑记》就有关于魏妃的记载。泾王去世后，魏妃每年春秋都会择吉日到西山烧香拜佛，而大悲寺是其必拜之所，常常会在此念佛吃斋多日。后来她为了表示自己的敬佛之心，于嘉靖二十九年与众人一起捐资修建了大悲殿。

《费县志》中还提到“土名‘朱公子城’者，在县东北四十里，或云即阳口山城，然遗址在龙山，且甚小，不似县治规模。俟再考。”应该就是这个王林，当时泾王的曹妃安葬在此，曾修建城墙，并有守军保护，后泾王去世后，王妃随迁葬至

北京，王林的明代墓就成了一座空坟，因王陵附近一定距离内不允许有人居住，故当地人对古墓了解甚少，传说中的“朱公子”应为泾王朱祐橚。

大崮传说

大崮又称云台崮，位于大顶子山西侧，五彩山之南，王林村以北。

山上有座庙叫大崮庙，里面有玉皇庙、娘娘庙、龙王庙、关帝庙、山神庙。庙宇有南北两个门。这个庙设计得很特别，在寺庙下面修了一条水道，类似我们现在的下水道。

水淹大崮庙的故事流传甚广。说很久以前，大崮庙有个千年的老道士，有一年下大雨，淤柴把下水道堵住了，雨水就漫到庙里，大崮庙里本身就有个龙王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老道士一急，赶紧把南门打开，结果雨水一泻而下，把老道士也冲走了。

崮顶有眼泉水叫做“跑马泉”，传说薛礼征东时走到这里，人困马乏，口干舌燥，马能辨识水源，知道这里有水，就有马蹄刨出一个泉子。因此，人们就称这眼泉为“刨马泉”，后演化为“跑马泉”。

有的南方人专门使坏，看到哪里有脉气，就专门来破坏。为了保护古墓，人们特地在此布下蜂兵。在古墓东二三百米有块石，上面有很多小洞，有的能放进一个拳头，据说里面住着一窝大马蜂，这些马蜂，是保护古墓的蜂兵。这里还有一块叫“瘪儿石子”的石头，石头上有两个窟窿，象牛角尖，小的一吹呜呜作响，大的却吹不响。南方人来了，王子就吹“瘪儿石子”的小窟窿召唤马蜂赶走南方人。

在这里的王子好奇，就吹吹小窟窿试试灵不灵，吹第一次，蜂兵来了，吹第二次，蜂兵又来了，吹第三次，蜂兵就不来了。

蜂兵失灵后，南方人来了。王林村东两块很大的石头叫“龙眼”，南方人在上面钉了个铁钉。王林村北原来有条大沟，村民称之为“后沟”，传说也是南方人挖沟破风水的，不过现在已经填平了。

臧西山和他的民兵模范队

高雷



臧西山（1918—2002），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抗日游击小组长、联防大队大队长。

臧西山和他的战友，利用地雷战，多次打击日、伪军对沂蒙革命根据地的入侵骚扰。共炸死炸伤日、伪军280多人，粉碎了敌人对我根据地的扫荡，保卫了我抗日根据地，鼓舞了我抗日军民的斗志。

臧西山被鲁中军区授予“爆炸大王”称号。1944年8月被山东军区授予“一等民兵英雄”称号。他所领导的民兵队被山东军区授予“民兵模范队”称号。整个抗战期间，山东抗日根据地仅有五名“一等民兵英雄”。

臧西山，高个子，红脸膛，蒙阴县野店镇毛坪村人，1918年2月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幼年给人家放牛，后租种了人家20多亩土地，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组织、带领家乡民兵与敌人作战百余次，其中独立作战10余次，多次以少胜多，而他的民兵分队没有牺牲一个人，这堪称奇迹。

漆黑的夜晚，狗叫声突起，人们从夜梦中警醒，竖起耳朵细听着外面的动静，战战兢兢地蜷伏着，估摸着鬼子汉奸的距离，随时准备着进山避难。

毛坪村外的岭上，荒草中有人在低声嘀咕，是臧西山的声音：“都到齐了？”“到齐了。”有人回答。他们是毛坪村民兵游击小组，一共五个人，组长臧西山，配备了一杆红缨枪，九颗手榴弹，他们是在巡逻中听到狗叫匆匆赶到此地的。他们身下卧着的这块地方，虽不经眼，却是军事要冲。向西是鬼子蔡庄据点，北边是汉奸陈三坎防地，西南是土顽郑小隐老窝。这里是进入蒙阴八区根据地的必经之路，而臧西山民兵游击小组则是楔在接合部的一颗钢钉。

抗战守土，无可厚非。毛坪村是个封闭保守的小山庄，对于臧西山组织游击小组，一开始村里的一些人不但不理解，还风言风语，说什么：“臧西山这些莽撞鬼简直要作死，这几个熊人，顶什么事！保护不了咱庄，倒要惹人家家来踢蹬咱。”更有以旧村长为首的几个人，吓唬臧西山，要把他们几个捆起来送给汉奸、土顽。家里的老人天天骂，不准孩子们回来吃饭，臧西山家的老人，恨臧西山挑头，怕给庄邻乡亲招惹是非，口口声声要活埋他。为了防范村里有坏人带汉奸来抓他们，游击小组栖息在山岭上，风餐露宿，一夜挪好几个地方。遇到敌情，他们这个山头上扔颗手榴弹，那个山头上吹吹洋号，与其说是吓唬敌人，不如说是为自己壮胆提劲。

这天又折腾了一夜，组员有人动摇了：“收兵吧，这个活干不下去了。”臧西山面孔严肃起来，斩钉截铁地说：“你不干就好受了吗？鬼子抓去是死，汉奸抓去剥光你的几亩地，土顽抓去得当兵——也是死，咱挨着，上级会帮助咱，反正豁上了，谁都不准放下武器。”

第二天，臧西山到区里去，扛回来一支钢枪，还有三粒子弹。

机会来了，700多敌人出动到这一带抢劫，附近几个村庄的粮食、衣服、牛羊，连破鞋烂袜、裹脚布子都抢个精光，山野里哭喊声震天动地。有一股敌人往毛坪村的路上来了，臧西山等着他们接近，突然从地上跃起。“打呀！”一阵手榴弹把敌人炸得晕头转向，跑掉了，臧西山他们在此守候了一天，敌人的铁蹄终究没能踏进毛坪村。

“莽撞鬼”成功地护卫了自己的家园，村民的眼睛里涌出了感激的热泪，老年人也跟着大家一起夸奖，青年人深受鼓舞，纷纷报名参加游击小组。那些悲观失望的情绪也消失了。

在此之前，以旧村长为首的一伙人暗通敌伪，不时地摊派钱粮，臧西山等人曾阻止过，他们始终阴奉阳违，这次旧村长也装酒杀鸡前来慰劳。大家数量起旧村长的胡作非为，搞不清这一伙人葫芦卖的什么药。在村里大多数人的要求下，臧西山带领群众罢免了他，选出了老实可靠的穷苦青年当了村长。村里集资给游击小组补充了手榴弹。

二

初生牛犊不怕虎。有了第一次胜利，臧西山民兵游击小组已不满足守卫家园，而是主动出击，专找敌人挑战，向敌人要武器。1940年，他们伏击了伪军押送弹药的一个连，抓获了3个俘虏，缴获了3支钢枪，119粒子弹。

1940年9月，经区农救会长张道成介绍，臧西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冬，在县委的领导部署下，以毛坪、烟庄、石泉、新庄、苏家庄、石人坡等村为主成立了八区民兵联防大队，臧西山任大队长兼副指导员，主要任务是保卫八区，保卫沂蒙根据地的西大门。不久，臧西山参加了鲁中区武委会举办的民兵爆破培训班，回村后便带领爆炸组制造出25斤重的石雷，挑选了身强力壮跑得快、有胆有识有特长的王东道、刘吉贵、王焕成、吴汉信、杨永庆、石全田、周段昌、臧昭林等12人，成立了“飞行爆炸队”，他自任队长。爆炸队每三人一组，精心学习各种埋雷技巧和打炸结合的地雷战战术，做好了地雷战的准备。

1941年5月的一天早晨，臧西山和两个组员去开会，刚出村，看见路上走着一支灰色的队伍，约莫30多人，扛着两挺机枪。臧西山眼珠一转，“不是八路的人。打他娘的！”他飞快跑回村里，吹起了哨子，组员们都去开会去了，没有人出来。时间不等人，灰色队伍越走越远。

“不行，得赶紧撵。”臧西山推上顶门火，窜了上去，两个队员紧跟其后。

“哪一部分的？”臧西山鼓起嗓子喊道。

“沈鸿烈……借路走！”

“不对，是陈三坎。”臧西山心里嘀咕，更加快了步伐。

对方一梭子机枪，把他的裤腿扫去了半边。他连发三枪，汉奸拖起机枪来就跑。他们紧跟不放，一口气撵出了十几里。

敌人累了，停在松林边歇息，臧西山他们绕道插到了汉奸前面，瞄准松林就放开了枪。



民兵把地雷埋到敌人的必经之路上

敌人措手不及，一呼隆又跑开了。林子里丢下了八支枪，还有40多颗手榴弹。一看枪栓都被摘去了，臧西山恼了鼻子说：“这一点礼物，还是没有栓的枪。你娘的，非拿机枪不可，死在战场上也得撑。”三个人捡拾手榴弹时，巧遇一位老乡，臧西山打发他去主力部队报告情况。

几个人又向前冲去，一会，又追上了，敌人的一挺机枪吼叫起来，挡住了他们的来路。突然机枪卡壳了，臧西山蹦了起来，高喊“冲啊！”敌人的另一挺机枪又响了起来。

硬冲是要吃亏的。臧西山放眼看了一下四周，“糟糕，钻到敌人肚子里来了。”前面是蔡庄，左侧是刘家峪，都有鬼子据点；右侧的东高庄就是这伙汉奸的老窝，距离十来里路。他三个人钻进了这个三角形地带。

两个组员注视着臧西山的脸色，等待着他拿出决断，臧西山盘算了一下，昂起头说：“走，到他们前头去，找个地方打，靠近鬼子据点也不怕！”

前面有两个山头，正好卡住了汉奸的去路，他们快速攀了上去，占据了有利位置。臧西山告诉队员说：“把他们的手榴弹全部奉还给他们，使劲打，保准得机枪，我一发枪，你们就动手。”

臧西山看见后面有两个老乡在垒地堰子，他招招手：“过来，过来。别害怕，没有孬事，俯下，把锨杆伸出去，跟着我吆喝，我喊什么，你们就喊什么。”两人眨眨眼睛，四下看看俯了下去。

喧闹声越来越近，七嘴八舌，灰色的队伍露出了轮廓，进入了夹道。

“呼！”“轰！”“轰！”“冲啊！”“杀呀！”手榴弹的爆炸声中，汉奸死伤一片。队伍溃乱了，前面的向前飞奔，后面的调转头急窜。就在这时，攻击的冲锋号吹响了，八路军来了。后面那部分汉奸像打愣的鸡，原地乱转，不知如何是好了。

臧西山一手持枪，一手紧握手榴弹，从山上冲下来：“不要动，谁动我打死谁，把枪放下！”

山上的几个人齐声喊：“缴枪啊！缴枪啊！”

“往那边走！”臧西山用手榴弹向东南一指，汉奸簇拥着挤向东南。

主力部队赶到了，臧西山兴奋的喊道：“同志们，快去追赶前面的敌人啊！”



沂蒙民兵埋地雷

这一仗，臧西山活捉了18个汉奸，缴获了17支步枪，一挺机枪，70多个手榴弹，1154颗子弹。

三

1942年春天的一个晚上，臧西山民兵分队接到了上级命令，因友军撤退，附近山区形成了空白地带，为防止鬼子乘虚而入，要他们立即抢占大崮区的龙须崮、斑崮两处战略要地。控制了此地，鲁中军区将有所依托，游刃有余。敌人呢，也正在打这里的注意。而此地离臧西山他们村庄40余里，对没有远离过家门的民兵来说困难重重，大家有所顾虑。臧西山知道不能讲价钱，他告诉大家说：“上级的命令要坚决执行。”夜晚，天空飘落着小雨，雾气迷濛，漆黑一片，臧西山带着17个人出发了。

雨水淋透了衣裳，山路磨破了脚掌，两次碰到鬼子岗哨，他们都巧妙地避开了，有的队员主张干掉鬼子，臧西山说：“任务要紧，不能惹麻烦，天明之前要占领龙须崮。”接近大崮区，山下有鬼子吆喝他们，山上也有鬼子询问，有的新队员吓哭了：“坏了，钻进鬼子口袋了。”“被围上就完了。”“龙须崮一定是鬼子站着，去了也白搭，回去算了。”

臧西山安慰他们：“不要怕，你们不相信我臧西山了吗？我有把握把大家带到龙须崮，不会叫大家吃亏。”

突破了一道道难关，队伍到达了龙须崮脚下，除了丝丝的雨声，没有了来路上的鬼子的嚎叫，四周寂静得可怕，崮上究竟是什么情况？臧西山脑海里打了个问号。下令说：“手榴弹扣上弦，上！”他前面开路，用手摸着道儿向上爬，遭雨淋的石头太滑，脚跣不住，整个人就溜了下来，汗水混着雨水湿透了衣裳，裹在身上透不过气来。人一刻也没能消停。

到顶了，臧西山示意大家止住脚步，自己奔向了寨门，石阶上的大门被石头封堵住了，他正寻思怎么进去，“干什么的？”门楼上发出了惊恐的声音。

有人！原来是友军于学忠部没能带走的伤病员。这些人见到臧西山他们像是见到了救星，欣喜万分。臧西山安慰着他们，派人把他们送下山安置。

崮顶上有友军留下来的小米、水，还有40多颗手榴弹，山崮的后面峭壁悬崖，崖边系着三根铁索，用于攀援，臧西山他们把铁索连根拔起，分组死守前门。

天亮了，臧西山派人到主力部队送信，晚上，独立营赶到了，龙须崮回到了我们的手中。臧西山又带领5个队员绕道占领了斑崮，从此这里成为了鲁中根据地的后方基地，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军区首长对此行动给与了很高的评价。

四

1942年3月的一天，臧西山接到上级敌情通报：新泰、土门的日伪军出动了，要对我抗日根据地岱崮一带进行“扫荡”，指示臧西山用地雷战法阻击敌人的行动。他立即带领爆炸队到达敌人必须经过的大坎岭下，依托有利地形巧妙地布下地雷。天刚亮，日伪军的炮车、马队、大车闯进了雷区，踩响了地雷，炸死7人、伤4人。敌人知道我军民已做好了防御准备，便用炮轰和机枪扫射一阵后，只好抬着死伤人员撤回。臧西山的地雷战首战告捷，各村庄乡亲们奔走相告，传颂着胜利消息。

这年冬季反“扫荡”，山东军区首脑机关转移到了毛坪，鬼子3000多人紧随其后。臧西山为掩护首脑机关，带着六个队员，迎风而上，凭借山崖，从早上一直打到中午，鬼子机枪大炮狂轰乱射了大半个晌午，发觉是些土八路，扫兴地撤退了。

1943年五月初七，日伪军从新泰、莱芜调集3000多人对我根据地大“扫荡”。臧西山接到县委的指示后，立即带领爆炸队到蔡庄、上温村、坦布林周围5处埋设了地雷，但都被狡猾的日军狼狗和尖刀班躲过，没有奏效。他们又在上温村村西小桥周围快速布雷，隐蔽在树林中观察敌人的行动。日军尖刀班在几只狼狗引导下过了桥，地雷却没有炸，队员们十分着急。但随后而来的20多人通过时，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有3个鬼子被炸飞了，伤了好几个，迟滞了日军的行动。为此事报纸上编了段快板书：“五月初七那一天，鬼子扫荡新蒙县，三路进攻根据地，挨了八路西瓜蛋，大腿炸成梢子棍，小腿挂到槐树飞上天。”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臧西山的爆炸队扩大为36人，并配备了从敌人手中缴获的轻机枪和其它武器，提高了战斗力。在讨伐汉奸吴化文部战斗中，他带领民兵连和爆炸队独挡一面，阻击增援之敌一整天，将敌击退。在反“扫荡”坚守龙须崮保卫战中，他带领民兵连和爆炸队浴血奋战，抗击敌人数次进攻。他带领爆炸队炸毁敌汽车一辆，击毙5名敌人。

1943年冬，日军开始了对我北沂蒙地区的“扫荡”。臧西山根据上级指示，带领爆炸队在日伪军必经的土门至岱崮的东西道路上摆下了地雷阵。日军大队人马晚上从土门东开，不一会就踏响了地雷，炸死日军2人，其中有一名小队长。日军大队停止前进，用机枪乱射，同时派出一小部分鬼子绕道田地里，继续开进。没走十步，又踏响一颗地雷，炸死日军1名，伪军1名。日军抬着4具死尸垂头丧气地撤回土门据点。

当天晚上，他们在田地里又布下了许多假雷。第2天，日军调来工兵排雷。八里路走了一天，而臧西山他们早躲在山窝里睡大觉去了。

上级的情报告知，扫荡的鬼子要原路返回，臧西山民兵爆炸队一夜埋设了20多颗地雷，守候了一天，鬼子没来。为了防止误炸群众，民兵按照操作规程将地雷起

出来，第二天再埋。

又过了一天，鬼子还没动静，第四天早晨，臧西山正在吃早饭，哨兵跑进来报告鬼子到了，他扔下饭碗出去看，黄澄澄的一溜，离村已不足二里路。再看看院子里的几挑子地雷一颗还没埋，臧西山脸色铁青，“这办的是什么事。”

他一边指挥36个民兵抢占山头，一边派人报告主力。自己提着两个地雷一张锨，飞快跑到沟底，在鬼子来的路上，三锨掘个窝子，放上雷，把旁边的驴屎蛋子捧上去，用脚轻轻一搓，就在这时候，助手起劲地摆手叫他跑，臧西山只当没看见，又提起另外一个，顺着路向前跑了几步，在小河沟里，把地雷埋在了一块踏脚石下，用锨改过水道，冲掉痕迹，猛然见三只狼狗蹿下沟来，用他自己的话是“和驴样大的三只大狗”。后面不远跟着一个鬼子。臧西山抛开铁锨，一个翻滚就势把背上的枪取了下来，推上子弹，趴在一个坟包后，开了火，前面的鬼子，已经过了小河沟，卧倒了，后面的鬼子改了道，恰巧踏上了小河沟里的踏脚石，“轰！”鬼子上了天。臧西山趁机窜上了山头，大家长出了一口气，说：“刚才我们吓坏啦，你埋的地雷被鬼子看见啦。”

200多鬼子向山头冲来，机枪，掷弹筒响成一片，臧西山他们沉着应战。鬼子的背后响起了枪声，是八路军独立营岳营长的部队。突然，臧西山他们的背后也响起了枪声，一看，原来是土门据点的鬼子增援来了。民兵们边打边退，与主力会合之后，一直坚持到黄昏，民兵和主力只有129人，鬼子近千，我主力牺牲9人，民兵没有损失，而敌人付出了90多人的代价，荒草上到处留下了鬼子的污血。

1944年5月27日，鲁中武委会召开会议，奖励模范民兵。臧西山荣获“战斗英雄”奖状。

1944年8月，山东军区战斗英雄民兵英雄大会在莒南召开，臧西山荣膺“一等民兵英雄”光荣称号，他所领导的民兵爆炸队被授予“民兵模范队”称号。

抗战胜利后，臧西山历任联防队指导员，野店区武装部副部长，新泰县武装部参谋，仍带领民兵战斗在第一线。1952年复员回乡，任生产队长、村支部书记等职。2002年去世，享年84岁。

记忆中的老建筑

关帝庙

本 编



临沂城关帝庙建于明代，位于东关街北段路西。民国初年，因“抬神办学”，关帝庙被废，成了“民众教育馆”。日本鬼子占领临沂之前，民众教育馆就停办了。后来，国民党四十军在这里设了医院。1945年，临沂城第一次解放，八路军在这里作了招待所。新中国成立后，在此成立了东关小学。



民国时期的临沂画坛

大荒堂主

清末民初，鼎革之际，西学东鉴，社会转型，对传统的中国美术产生了巨大冲击，以致于有美术革命之说，这也为临沂画坛的辉煌开创了局面。民国临沂画坛流派纷争，名家斗妍。

民国临沂画坛大致可分为三个流派，闻名全国的画家主要有四位。

三个流派其一是莒县的于氏画派。其代表人物为于成章，莒县于家庄人。生于光绪元年（1875）。书香门第。于氏世代以绘画名重莒县，更以牡丹名动齐鲁。其先祖于学训、于香涛、于寿山、于寿三、于子谷等，都精于牡丹，并一脉相承，且风格非常相近。于成章天资聪慧，传承着祖先们的聪明才智，得到了父辈祖辈们的长期指教，且与弟弟于少山、侄于朋远等不断切磋技艺，加上勤学与苦练，画技大进，终成一代牡丹名家，并以“于成章”之名名重于世。于成章约于1950年左右卒于大连。

于疆辰（1866—1944），名树封，字疆辰，以字闻名于世，又字疆辰、疆臣，家居莒县城东大街。与于成章同族，出身于商绅之家，通经史，精经营，善绘事。宣统元年，曾为山东谘议局议员，民国元年（1911年）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连任莒县商会会长，属德高望众的绅士。于疆辰善画墨牡丹、白菜、虾蟹等，民国以来，为莒地画界之佼佼者。一度引领莒地画风上百年，即使当代莒地书画家的作品里也依然有其画风的影子。

其二为寓居郯城码头的松年一派。



于疆辰《墨牡丹》

松年（1837—1906）晚清书画家。姓鄂觉特氏，字小梦，号颐园，蒙古镶蓝旗人，自1876年（光绪二年）始，在山东昌邑、汶上、博山、单县、长清县或代理或任知县。性不谐俗。虽为官，但整日浸临书画之间，无意仕途。工书法，喜用鸡毫自成一家。画工山水、人物、花卉、翎毛，兰竹，用笔豪爽，喜画元书纸，工于用水，秀润可爱。罢官后，流寓济南创办枕流画社，被推为“盟主”，一时从学者众。寓居郟城码头之时，授徒数人，佼佼者有石屏山等人，其画风对临沂甚有影响。

其三为教书先生岳祥书及其门人。

岳祥书（1913—1979），字瑞麟，号祥书、木鱼子，曾用名湘絮、乡蔬、鸿祥、翔舒、松风斋主，别署洗我轩、伴蛩居、槐荫画室、大吉堂、泉韵轩。生于河南省开封市，18岁迁居山东，毕生从事美术工作，绘画领域涉猎广博，中、西绘画皆通。1931年—1932年在临沂县县立师范讲习所、临沂县省立第三乡村师范学校任美术教员，课余时间开办夜校，普及大众，授人无数。

四个主要的知名画家。一是庄昺熙（1887—1947），字景楼，莒南县大店镇人，出身乡绅，清末太学生，1909年加入同盟会，庄昺熙自幼绘画，后入上海美专学习，与刘海粟、徐悲鸿皆有交往，绘画以工写兼具，清新不俗，尤其是大写意，别具一格。

二是宋鼎（1892—1976），字洛九，以字行，临沂县人。早年毕业于上海美专，后长期隐居。攻书画善篆刻。山水花鸟皆精，形神兼备，功力不凡。

三是王文俊（1910—1985），女。临沂城人。著名画家。自幼随父母寄居济南，曾就读于山东省立女子中学。毕业后到青岛市立中学任音乐教师。在青岛经常随三哥王玫参加音乐演奏活动，曾参加演奏大型乐曲《满德林》。她受大哥王卓之影响，酷爱绘画，后考入北京女师大美术系深造。毕业后定居天津，结识了许多京津著名书画家。

“七七”事变后移居香港，继续刻苦研磨国画艺术。1955年侨居美国纽约。先后得中国著名书画家王济远和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师教，绘画技艺大进。在上世纪60年代就成为纽约著名中国女国画家。1961年在纽约同王济远、张大千举办3人联合画展，展期长达



岳祥书油画《临沂十三孔桥桥头》

诗画赏析

两月之久。

四是崔祝生（1905—1997），莒县汤家庄人。1924年考入山东省立师范艺术专修科学习，受到著名画家吴天墀指教。1932年考入上海美术绘画研究所，成为该校第一届研究生，受到刘海粟、潘天寿等大师指教，业余时间还听取了鲁迅先生关于木刻艺术的讲座。而后辗转济南、四川等地从事美术教育，先后多次举办个人画展。1947年在济南与人合办私立中国艺术专科学校，他先任教导主任后任校长，著名画家黑伯龙、刘鲁生等先生都曾在该校任过教。济南解放后，他先后被推选为济南市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济南市美术研究会副会长，济南市美术创作研究会副主任委员。1966年冬，被下放到偏僻的农村老家。直到去世的30多年里，一直隐居乡间。



民国年间出版的《当代名人书画略历》收录的宋洛九书画



崔祝生《墨竹》

八路军一二九师津浦支队始末 及后续发展 (上)

泰宁军

抗战初期的八路军津浦支队，以八路军一二九师部分干部和奇袭阳明堡机场的英雄连队为基础，于1938年2月9日在河北南宫县正式成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这支部队在孙继先、王吉文等名将率领下，转战冀鲁边、泰西、滨海、鲁中南及中原、华东各地，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诞生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津浦支队的组建

津浦支队的前身是八路军一二九师挺进支队。

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一二九师挺进敌后，于1937年11月到达晋东南辽县。为侦察铁路以东情况，联络地下党与一切抗日组织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由师教导团的30名干部和师后方留守处军政干校的部分学员组成挺进支队，七七二团参谋长孙继先任支队长，胥光义任政委。12月13日，挺进支队横越平汉铁路到达冀南任县，这是八路军开往冀鲁豫平原的第一支部队。

1938年初，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在陈再道司令员率领下来到冀南开展抗日活动。2月8日，东进纵队进入河北南宫县城，第二天，东进纵队以挺进支队为骨干组建起津浦支队，原挺进支队司令员孙继先任支队长、当地地下党领导人王育民任政委，支队下辖原东进纵队第5连、工兵连和特务连，共约400人。东纵五连原为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六九团十连，是1927年在黄麻起义中诞生的老红军连，参加了奇袭阳明堡机场烧毁敌机24架的战斗；工兵连由一二九师直属工兵连的一个排在南宫县扩建而成；特务连由南宫地方党组织发展的抗日游击队编成。

支队组建后即南进山东，于2月15日到达山东夏津、恩县一带，从此直到抗战胜利，一直战斗在齐鲁大地。

津浦支队初期发展

至1938年4月，支队在恩县陆续接收了一批自愿抗日的青年，改编了部分道会门武装，又编入恩县党组织发展的七八十人。随着部队扩大，成立了津浦支队第一营，辖3个连，五连、特务连保持不变。

6月，津浦支队参加东进支队统一组织的柳庄战斗，战后回夏津休整、扩军，发展到700余人，组建了第二营。

8月2日，接受宁津“抗日铁血团”请求，该部编为津浦支队教导大队，到11月初，支队发

展到3个营、1个骑兵连，共1000余人。

1939年1月底，鲁西北特委直接领导的冀鲁边游击支队编入津浦支队为新一营，辖4个连400余人。

1939年6月7日，徐向前由冀南来山东组建第一纵队，调津浦支队一营负责护送，随后一营留在第一纵队总部，脱离津浦支队建制。

1939年9月18日，津浦支队在宁阳杏山遭日军包围，激战一天伤亡很大，支队警卫连仅剩10余人，新一营营长牺牲、缩编为1个连。支队突围后越过津浦铁路，进入鲁中南地区。

津浦支队后续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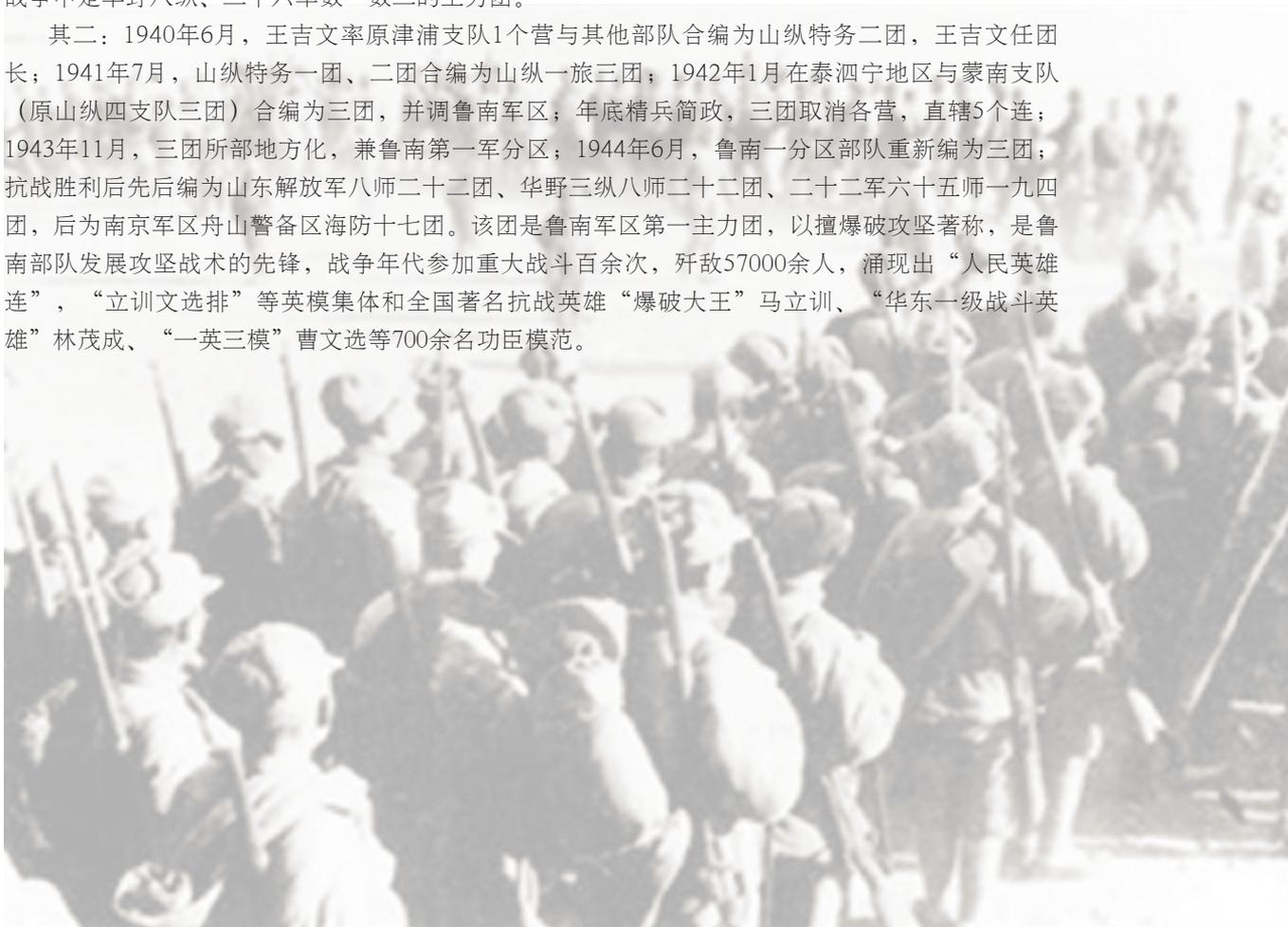
津浦支队成立后一直由一二九师领导，主要活动在冀鲁边地区，随着调往鲁中南，津浦支队获得了新的发展，所部也多次改编。

1939年11月4日，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津浦支队脱离一二九师建制，调入山东纵队。1940年2月，津浦支队与山东纵队第二支队（老）合编为山东纵队第二支队（新），津浦支队番号撤销。

此后原津浦支队部队分成两条线发展，支队主力编入山纵二旅四团，支队1个营由王吉文带领编入山纵特务团。

其一：1940年9月，二支队与九支队合编为山东纵队第二旅，原津浦支队主力编入二旅四团，1942年8月编为一一五师教导一旅四团，1943年3月调鲁中军区为第四团，抗战胜利后先后编为山东解放军四师十团、华野八纵二十二师六十四团、二十六军七十六师二二六团，新中国成立后为南京军区三十一集团军八十六师二五六团。该团是原山东纵队、鲁中军区中唯一一个以老红军为基础、以老红军连队为主力组建的团队，在后来的华野八纵、二十六军内被称为“红四团”，战斗力很强，抗战时是一一五师兼山东军区13大主力团之一、鲁中军区3大主力团之一，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是华野八纵、二十六军数一数二的主力团。

其二：1940年6月，王吉文率原津浦支队1个营与其他部队合编为山纵特务二团，王吉文任团长；1941年7月，山纵特务一团、二团合编为山纵一旅三团；1942年1月在泰泗宁地区与蒙南支队（原山纵四支队三团）合编为三团，并调鲁南军区；年底精兵简政，三团取消各营，直辖5个连；1943年11月，三团所部地方化，兼鲁南第一军分区；1944年6月，鲁南一分区部队重新编为三团；抗战胜利后先后编为山东解放军八师二十二团、华野三纵八师二十二团、二十二军六十五师一九四团，后为南京军区舟山警备区海防十七团。该团是鲁南军区第一主力团，以擅爆破攻坚著称，是鲁南部队发展攻坚战术的先锋，战争年代参加重大战斗百余次，歼敌57000余人，涌现出“人民英雄连”，“立训文选排”等英模集体和全国著名抗战英雄“爆破大王”马立训、“华东一级战斗英雄”林茂成、“一英三模”曹文选等700余名功臣模范。



从历史深处回望故乡

——读王兆军近作《春秋故城祝丘》

钱勤来 王韵然



作为从临沂走向世界的著名作家，王兆军先生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是在回望故乡。他深情依依，泪眼婆娑，一步三回，回望着自己的故乡，抒发着浓郁的乡愁，寄托着深沉的理想。近年来，他不仅在故土上开设东夷书院，传播文化，培育人才，还创作了《问故乡》《黑墩屯》等纪实作品和《把兄弟》等小说作品。最近由济南出版社出版的《春秋故城祝丘》一书，则是他转换视角，从历史的深处，深情地回望故乡的又一力作。

祝丘城坐落在临沂市河东区，介于沂河和沭河之间，自古以来就是东夷族群的生息繁衍之地，具有数千年的文明史。这里曾发生过许多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涌现过灿若晨星的杰出人物，是临沂历史的一处重要见证。

《春秋故城祝丘》不是小说，而是一部用心血浇成的故乡考古之作，回望深度，前所未有；写作难度，空前提高。可以看出，作者几乎调动了自己所有的知识积淀，借鉴了所能见到的有关文化成果，纵笔挥洒，合理想象，才完成了这项艰巨的文化使命，为父老乡亲呈上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一个绝代美女，一座春秋故城。在“春秋无义战”的乱世背景中，作者以文化考古的精神，谨慎细致地确定了春秋故城的地理位置及其来龙去脉。历史上的祝丘，是周王室用来祭祀土地的一处大台子，在这周围后来形成了一个县城，因为靠近祝丘，被命名为即丘。二者其实是一个地方，位于今天的河东区汤河镇。在这里，演绎了一幕有情而又无奈的历史大剧，这就是鲁桓公薨后其夫人文姜移居祝丘城。

历史是如此的冷峻。2700多年前（公元前694年），鲁桓公被齐襄公派人杀死于车中，于是与齐襄公有染的鲁桓公之妻文姜就处在了舆论中心。这段历史载于《春秋左氏传》和《史记》当中，据此，王兆军先生还写了一部新作《乱世之花——文姜传》。而在《春秋故城祝丘》中，通过对古代典籍的梳理和有关史实的考证，作者以史学手笔展现了文姜之于祝丘城的重要作用：她虽德行有亏，但时时想念着独力支撑鲁国的儿子庄公，牵挂着鲁国的大事小情，并终于明白“鲁国的盛衰存亡就是我们母子的根本利益”。于是，她毅然由齐返鲁，辅助当时只有13岁的儿子，并富有远见地选择了“不齐不鲁、又非莒国”的祝丘作为栖居之地，这正体现了她的政治谋略和现实考量的高明。作为鲁国太后，她住在祝丘，对于其后扩建祝丘、建制即

丘，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当时，祝丘成为了事实上鲁国的合法之地，这是文姜不费一兵一卒为鲁国谋得的一方宝地，其功大矣。鲁桓公被杀后，文姜这位杰出的女性开始了真正的治鲁历程，特别是齐鲁长勺之战，鲁国大胜，文姜的支持起了重要作用。

王兆军先生还设计了一段齐国的管仲为文姜祝寿的情节，可谓合情合理、别开生面。政治家管仲当年是个商人，与鲍叔牙一起经商，二人当年的“分金台”至今留存在相公庄，见证着他们的友谊和义气。文姜50岁那年，管仲身为齐相专程前来拜访祝寿，他单车独马，不带随行，就是为了感激文姜当年的举荐之恩，并且在诚恳的谈话中，为文姜解开了多年的心结，令她如释重负。

公元前673年，文姜与世长辞。一百多年后，孔子作《春秋》，如此表述：“庄公二十二年，癸丑，葬我小君文姜”。孔子笔下没有臧否，而是化作了一句“春秋隐语”。据此，王兆军先生对文姜作出了如下评价：“文姜的一生是灿烂华丽的，也是切实而沉重的。她是春秋时代的绝代美女，也是一位追求自由的性情中人。她是一位善于学习的政治家，一位坚持不懈的改革家，为鲁国的生存和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伟大女性。”没有文姜，就没有鲁国的壮大，没有文姜，就没有古城祝丘的繁华。

文姜走了，历史依然在曲折中行进。到了汉代，祝丘也就是即丘处于最为繁华的时期，后来即丘县并入临沂县。于是，作为曾经持续繁荣了一千多年的重镇，即丘被日渐崛起的临沂城所替代。

振叶寻根，观澜溯源。在王兆军先生笔下，再现了一座春秋古城的风貌和沂沐河两岸东夷文化的发展轨迹。其中，以大农庄遗址为代表的龙山文化和以凤凰岭遗址为代表的细石器文化，使这方文化沃土更加耀眼辉煌。为了弘扬东夷文化，作者在书中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借助于汤河湿地风景区的建成开放，结合《春秋左氏传》的历史故事和美女政治家文姜的形象，祝丘城可以重建为一处旅游景点和历史文化博物馆。

若如此，一个崭新的春秋故城会从古老的史书中复活，并向我们款款走来。

回望历史深处的故乡，这里曾是文化的高地；展望蓬勃发展的河东区，“五区托一城”战略正谱写新的篇章。我们不禁诗情满怀，更加自信：

东夷遍开文明花，旦彰庶几亚细亚；
故城复兴不是梦，凤凰蓄势已奋发。





解放战争时期的临沂飞机场

本 编



1934年3月，临沂城郊西南隅临时修建了一个小型飞机场，这是山东省内第一座民用机场。当时，为了消灭刘黑七、孙美瑶这样的大股匪帮以及众多大大小小的匪群，兼任临沂县长的范筑先请求上级调军队到临沂来剿匪。为了空运部队，范筑先决定修建飞机场。机场占地面积3900亩，其坐落位置，大致是现在的解放路以南，银雀山路以北，东起通达路，西至开源路之间。机场设备十分简陋，没有导航仪器，飞机跑道是略加整平的黄土地，候机室就是几间平房，房顶上书“临沂”两个白色大字，作为飞机降落的识别标志。机场建成后一直未能有效启用。1937年抗战爆发后，第五战区又令地方将机场扩大，以备战时之用。直到1946年国共和谈期间，飞机场才真正发挥了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山东省党政军领导机关、新四军军部，相继迁驻临沂城，临沂成为我党我军在山东的政治中心。由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三方代表组成的三人军调小组，频频飞抵临沂，与陈毅、粟裕等晤谈。1946年1月30日，驻徐州三人小组，美方代表黑里斯上校、国民党代表李树正、中共代表王世英首次飞抵临沂。2



陈毅在临沂机场欢迎北平军调部济南执行小组美方代表雷克上校



黎玉走下飞机

月2日，驻济南三人军调小组，美国代表雷克上校，中共代表陈叔亮等飞到临沂，新四军军长陈毅亲自到机场迎接。联合国救济总署运输救济物资的运输机也在这里起降。联合国救济总署官员、美国海军陆战队驻青岛部队军官以及济南、徐州三人小组成员，又分别多次飞抵临沂。一时间临沂机场异常繁忙。

临沂城解放后，允许群众利用机场空闲地开荒生产，到1946年国共和谈时，老机场大约只剩300亩，但不影响飞机起落。没过多久，内战爆发，和谈中止，没有了飞机起落，机场从此荒芜。到上世纪50年代，机场逐渐变成了粮田。



陈毅将军专程到飞机场迎接贵宾



华东军区有关人员等待贵宾

姓氏百家漫谈——朱姓 (五)

赵丹峰



明宣宗朱瞻基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在北征回师途中病逝，享年65岁。他在位22年间，以其非凡的文治武功将大明王朝推向了鼎盛时期。清康熙皇帝对永乐盛世曾给予高度评价，称誉明永乐一朝中国的强盛“远迈汉唐”。正因如此，明成祖朱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少有的盛世名君之一，被载入了史册。

明成祖去世后，太子朱高炽于同年八月即皇帝位，是为明仁宗，年号洪熙。翌年五月，在位不满10个月的仁宗病逝，年仅48岁。明仁宗朱高炽病逝后，27岁的太子朱瞻基于同年六月即皇帝位，是为明宣宗，翌年改年号为宣德，在位10年。明仁宗即位后，一改父亲当年过于追求事功的国策，转而采取较为稳健务实的治国方略。这一方略又被其子明宣宗所继承延续。在军事上将原持的以战略进剿为主改为以积极防御为主，修复、缓和了朝廷与蒙古各部落的紧张关系。在政治上，一是赦免了建文朝获罪诸臣的家属，解决了历史遗留冤案；二是大胆起用了杨荣、杨士奇、杨溥为代表的一批贤臣良吏，并给予内阁大学士“三杨”以“票拟”之权（即阁臣可对中外重大奏事用小票墨书处置意见，贴于奏章旁边面呈皇帝，皇帝则据此裁定国事），使内阁大学士成为虽无宰相之名，但有宰相之权的辅臣（群相）；三是慎用酷刑，对贪污案件采取依法论罪，不再法外用刑，废止了“宫刑”和“连坐之法”，但对贪腐和不称职的官员予以果断处置，决不姑息纵容。在经济上，一是减轻徭役，二是鼓励发展生产，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上述举措，客观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使这一时期未发生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从而出现了政治相对清明，社会较为安定，民众安居乐业，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的局面，成为明朝发展进程中的“黄金时代”，被史家誉为“仁宣之治”。

在明代，还出了一位有作为有建树的皇帝，他就是明孝宗朱祐樞。明孝宗系明代第九代皇帝，登基后改元为弘治。即位后，年仅18岁的明孝宗一改其父明宪宗朱见深执政时的弊政，罢斥倖臣，重用徐溥、刘健等一批正直、练达之臣，且善于纳谏，广采群言，使此期出现了“朝多君子”的局面。孝宗本人勤于政事，力事节俭，减

轻了人民负担。在国家建设方面，他做了两大利国利民的建树：一是治理河患。孝宗即位后，黄河于弘治二年（1489年）在开封及黄陵冈决口，翌年又在原武决口，分为三支泛滥。弘治五年，黄河又在张秋决口，孝宗命浙江左布政使刘大夏为右佥都御史前往督治。两年后又再次在张秋决口。此次奉孝宗旨督修黄河的刘大夏不再急于动工，而是沿黄河行走千余里进行实地勘察，而后与山东、河南地方大员一起共商治河之策。在摸透实情，集思广益的基础上，确立了张秋乃下流咽喉，不可即治，而应先治上流，再筑大堤的治河思路，通过开凿新河和疏浚淤河，使黄河分两道入淮。河流既分，水势即缓。弘治八年，刘大夏又请筑塞黄陵冈以疏导黄河经徐州入运河，使原南流故道得以恢复。经此次科学治理后，在孝宗一朝未再有水患发生。二是编修《大明会典》。弘治十年，孝宗下旨命阁臣徐溥（翌年即致仕）、刘健、李东阳、谢迁等负责编纂自明朝开国以来的制度典章，以官职制度为纲，据事系年，汇列于后，粹而为书，以成一代之典。经四年辛勤搜考汇编，终成书付梓。《大明会典》对历朝制度沿革作了详尽的记载，为日后官府施政提供了遵循参考的史料依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此后，历朝均依此例，编纂会典，代不断章。从正统到正德年间，明代正由强走向衰落。明孝宗执政的弘治一朝正属于这一衰落期中的一个时段。在为期18年的历史时段中，孝宗汲取前辈教训，励精图治，多有兴革，使正呈衰落之势的明朝一度出现了“朝序清宁，民物康阜”的盛世局面，被史家誉之为“弘治中兴”。

除上述有作为的5位帝王外，在明代，还有一批朱姓人士在政治、军事和文化领域做出了突出建树。在政治军事领域，朱纨因抗倭而名垂青史。古时，中国习俗称日本为“倭国”。自元末始，处于南北割据时期的日本政局混乱，一些日本武士、商人和浪人便到中国沿海进行武装走私劫掠烧杀，时称为“倭寇”。洪武时期，由于朝廷加强海防，倭寇的骚扰洗劫处于可控范围。到嘉靖时，由于海防废弛、吏治腐败，倭寇活动遂呈猖獗之势。浙闽两地沿海一些豪门势家、巨商和当地海盗见势亦纷纷或明或暗地与倭寇勾结，致使倭寇更加剽掠无恐，任意荼毒苍生，祸害百姓。为减轻倭患，安抚百姓，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朝廷调右副督御史朱纨巡抚浙江，提督浙闽海防军务。朱纨到任后，通过实地调查发现，浙闽两地倭患之所以呈猖獗蔓延之势，是与一些中国富豪、巨商下海走私，与倭寇互相勾结以图谋利所致。于是他上疏朝廷指出：“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滨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难。”于是，他大力整顿海防，实施严厉的海禁政策，并搜捕通倭之奸民。而后先出兵讨平覆鼎山海盗，再于翌年春集中兵力，进剿由闽、浙巨盗李光头、许栋占据的宁波双屿，并派兵分驻漳、泉、福、宁以遏制其去路。此战一举捣毁匪巢，并在双屿筑寨设防。将匪首李光头、许栋等诸海盗及走私海商计90余人处死，朝野为之震动。朱纨亦因此作为明嘉靖朝抗倭斗争的第一人而名载史册。朱纨抗倭剿海盗虽得到广大百姓拥护，但却使一批因通倭寇靠走私获利的豪族巨商以及与之暗通关节的地方官吏失去了财路，于是便联合京城某些大员，联合向明世宗上疏，诬告朱纨抗倭剿匪“举措乖方，专杀启衅”，世宗非但不褒奖抗倭有功的朱纨，反听信群小陷构，下旨将朱纨免职回籍。面临昏君、“濒海之盗”和“衣冠之盗”的合击，耿直刚正的朱纨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朱纨死后，原由其招募捕盗的几十艘大船即被遣散，浙闽海防更趋空失，一度平息的倭患遂死灰复燃，且愈演愈烈。

青春无悔

——追记我驻索马里使馆警卫人员、武警战士张楠

张东波 刘 新 关晓虎



妈妈挎包里，一直装着你送的那把木梳。妈妈心里，你永远是个面带微笑、懂事听话的好孩子。

张楠，如果你没有牺牲，2016年该是29岁了。

或许，你正和同龄人一样，结婚、生子，享受青春和阳光；或许，你正和战友们在一起，在训练场上挥汗如雨，训练间隙欢歌笑语；或许，你正陪伴在父母身旁，听老人絮叨，同享天伦……

然而，一年前的今天，你却安静地躺在覆盖着五星红旗的灵柩里，在战友们的护送下，从万里以外的索马里回到祖国的怀抱。

在你的身后，留下的是武警部队为你追授的沉甸甸的“中国武警忠诚卫士”奖章和“献身使命的忠诚卫士”荣誉称号。

自我超越

“报告！我叫张楠，是楠木的楠，不是困难的难！”时任武警山东省总队临沂市支队警务参谋的井跃华，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新兵张楠时的情形。

张楠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张圣林是一位有着11年军龄的转业军人。耳濡目染，张楠从小就萌发了当兵的念头。

2004年底，张楠做出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重要选择。在老家河北吴桥“杂技大世界”杂技表演已小有名气的张楠，成为一名武警战士。

多年来，张楠时常会拿出那张他入伍时胸戴红花、手提行李，列队走出火车站时的老照片“显摆”一番。照片中，身高1.78米的张楠昂首挺胸走在最前。他说：“我就是当‘排头兵’！”

新训中，张楠把“排头兵”的劲头演绎得淋漓尽致：400米障碍，鞋子掉了，他就光脚跳壕沟；队列训练，动作不协调，他就在别人休息时加班加点，连做梦都会摆出队列动作……

在新兵结业军事考核中，张楠脱颖而出，夺得总评第一名的好成绩。

在入伍后的第7个年头，他凭借过硬的军事素质，被特批成为一名特战队员。

然而，要真正成为一名出色的特战队员，张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机动中队训练课目多、难度大，很多需要从零学起。

但，这难不倒张楠！

中队抓绳攀登他第一个上，别人爬一遍，他就爬三遍；武装五公里越野，他在背囊里多装上几块砖头；射击不够精准，他在枪管上挂砖头、吊沙袋。每次训练结束，他的胳膊都肿胀着，吃饭时连筷子都拿不起来，身上经常是伤口连着伤口、血泡连着血泡……

但张楠总是乐呵呵地说：“我爱军营，喜欢挑战，才不苦！”

2012年，总队组织特战分队武装越野考核，最后一段是长达一公里的陡坡。此时，大家都已疲惫不堪。张楠取下胸前号码布上的别针，狠劲刺向大腿，一咬牙奋力冲向终点。

这天，总队举行狙击手实战考核，突然狂风大作、沙尘弥漫。最后出场的张楠很快进入状态，最终以92分的成绩夺冠。他创造的纪录至今无人能破，被战友称为“铁男”。上级把唯一一支高精度狙击步枪配发给了他……

入伍11年，张楠先后2次荣立三等功，多次被总队表彰为“军事训练标兵”和“十佳优秀士官”。他所带班在总队和支队各项考核比武中，先后夺得15项第一，21名战士成为训练尖子和班长骨干，28人立功受奖。



责任重如山

张楠所在部队，驻守在传承着“沂蒙精神”的革命老区，部队日常教育和驻地红色文化的熏陶，使张楠深深懂得军人肩头责任的分量，他也以实际行动实践着“沂蒙精神”。

他在日记里写道：“作为人民子弟兵的一员，我们就是要保百姓平安，在急难险重任务中上一线、打头阵！”

2011年4月29日，蒙山森林公园突发山林大火，严重威胁到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张楠带领全班战士最先赶到火场。

面对肆虐的火魔，张楠第一个爬上陡峭的山壁，拿起灭火器冲入火场，与火魔展开搏斗。战斗持续三天二夜，张楠和战友们几乎没有合眼，脸被熏得黝黑，手上满是燎泡，直至山火被全部扑灭。

入伍以来，他先后10多次参加执勤处突、抢险救灾行动，抓捕犯罪嫌疑人10多名，救助遇险群众40余人，次次出色完成任务。

2014年9月，张楠所在部队接到了选拔驻索马里大使馆警卫人员的任务。

此刻，张楠正陷入痛苦的两难抉择：就在一个月前，唯一的姐姐因患乳腺癌刚刚离世。

白发人送黑发人，父母悲痛至极，令张楠揪心牵挂。

平时，张楠对父母特别孝顺，他舍不得给自己买一双好鞋子，却为妈妈花600多元买梳子和镜子，只为妈妈高兴。从小到大，张楠从没有和爸爸妈妈拌过嘴，是公认的“乖孩子”。

可是，此时赴境外执行危险任务，岂不让父母日夜悬心、再添愁容？

最终，张楠还是报名参选：“自古忠孝难两全，我是一名老兵，军人责任大于天！”最终得到父母理解。

经过近乎苛刻的考核，张楠从总队500余名特战精英中脱颖而出，以24个课目全优、总评第一的优异成绩入选。

士兵荣光

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战火纷飞，绑架、爆炸、冷枪时常发生。

2014年2月，张楠所在8人警卫小组抵达摩加迪沙中国大使馆驻地。顾不上倒时差，张楠和战友们即刻进入警戒状态，全力护卫我使馆安全。

作为警卫小组年龄最大的士兵、班长，张楠每天一丝不苟，从使馆安全到使馆人员武装随卫，精心安排，周密布置勤务，确保万无一失。

一次，张楠和战友护送大使外出。在通过一处街头检查站时，前方突然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声。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大家还没回过神时，坐在大使左侧的张楠，已经扑在大使身上，用身体护住大使。

同时，他果断指挥其他战友进入战斗状态，迅速撤离危险区域……

危机四伏的索马里，没人能预料到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2015年4月14日，距我使馆不远处的索马里政府机关突遭恐怖袭击。一时间，火光冲天，流弹四溅，爆炸声连成一片……

张楠和战友立即按照预案进入高度警戒状态。突然，一颗流弹飞来，正处于警



戒区外侧的张楠不幸中弹。

经医院紧急抢救，张楠幸免于难。经查验，子弹从张楠左胸射入，距心脏仅有一厘米。

张楠身负重伤，总队党委决定并通知张楠回国养伤。还躺在病床上的张楠急了，挣扎着爬起来给总队司令员李苏鸣打电话恳求：“一定尽快康复，重返岗位，不辱使命！”

为了这份承诺和信念，张楠以顽强毅力开始了伤体康复训练。手术第3天，他要求出院；第7天，他坚持下地走动；第16天，他开始恢复体能训练；第28天，他重返执勤岗位……

在疗伤的那段日子，张楠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亲人、战友和祖国，郑重地给中队党支部写了一份长达7页纸的思想汇报：“生命是最宝贵的，但人总会有一死，有的轻如鸿毛，有的重如泰山。作为新时期的军人，就是要有英勇无畏的气概！”

未料，这竟成张楠绝笔。

2015年7月26日16时，我使馆所在酒店遭自杀式炸弹恐怖袭击！

巨大的冲击波将使馆所有门窗击碎，坍塌的天花板重重地压在了正在执行警戒任务的张楠和另一位战友的身上……

因伤及动脉失血过多，张楠鲜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8岁！

张楠牺牲后第5天，中队党支部收到张楠那份漂洋过海、辗转万里的思想汇报。睹物思人，中队长井跃华和战友们不禁潸然泪下……

“原本可以从事演艺事业，但他选择了军旅；原本可以不当特战队员，但他选择了磨砺；原本可以不去索马里，但他选择了出征；原本可以提前回国，但他选择了坚守。张楠烈士用生命诠释了新一代军人的时代担当。”一位将军含泪概括了这位士兵短暂而精彩的人生。

英雄张楠，青春无悔！

“相傳”之救危之星 (下)

——记宋文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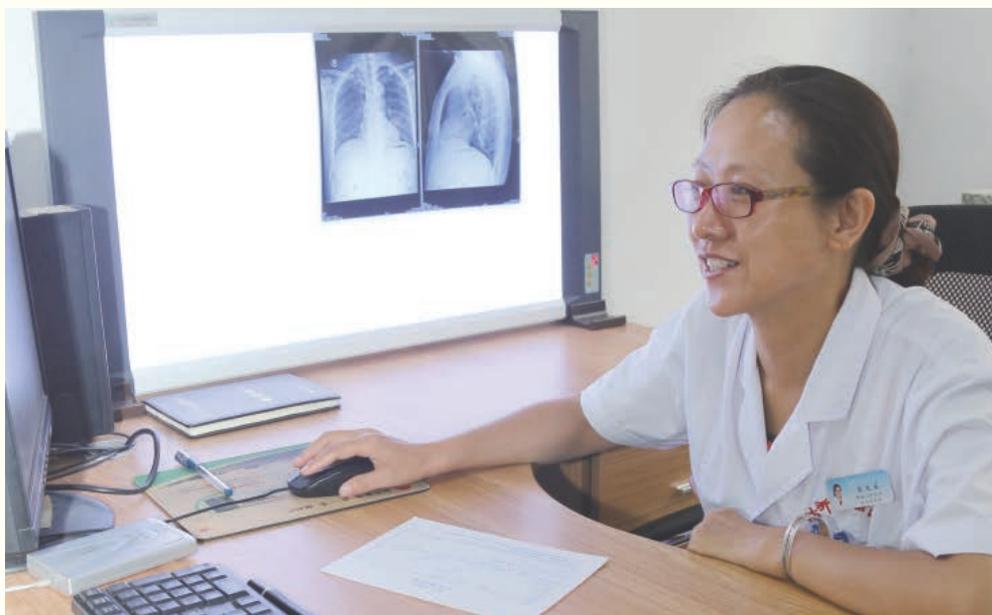
刘凤才

三、群星在她的期望中荟萃成长

2011年6月，宋文采担任了呼吸二科主任。而当时她面临的状况，却让人很“囧”，相当不容乐观。由于整体技术水平不高，对外也没有多少名望，前来诊疗的患者屈指可数，科室门可罗雀。早在10年前，科里就配备了两台支气管纤维镜，但是一年只能做五六十例诊疗，利用率低得可怜。人在困途的同事们，很无奈、很郁闷但用很精准的专业术语自嘲道：“宋主任，我们科现在是标准的‘呼吸衰竭’！”

宋文采不这么看。她认为，事在人为，路在脚下，当务之急是在提振团队士气的前提下，下真功夫大力气，把业务水平提上去。手里有了金钢钻，才能揽得瓷器活；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只要业务水平上去了，服务质量提高了，患者自会找上门来。而她自己，则决心当好这个学科领军人，团队总领队兼总教练。

她首先在科里提出并叫响了一个很鼓劲、很提神的口号：“我的进步你见证，你的成长我见证！”在这一口号的激励下，全科形成了一种相互学习、相互鼓励、相互帮助、相互竞赛的浓厚氛围，产生了一种“比学赶帮超”的强大正能量，人人



都在为抢救科室的“呼吸衰竭”而团结一致、聚心凝力。

她坚持从基础抓起，从基本功练起。她把已经“撂下的活儿”穿刺操作再拾起来，手把手地教大家操作要领、心得体验。时间不久，大家的水平果然有了提高。宋文采说：“现在科里的每个人，都能熟练地掌握这一基本功，甚至做得比我都好！”

她制定了严格认真、雷打不动的业务学习制度：每周一、三、五一早，学习西医专业理论，交流临床经验。每天早上，在信息群里发一个中医验方，让大家熟背牢记。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学习交流考核。

她坚持身先士卒，率先垂范。日常工作处处以身作则，各种规章制度带头遵守执行。遇到危重病号，她更是第一个冲在前面，敢于担当，不怕风险，她的行动本身就是一声响亮的“集结号”。为了抢救病人，几天几夜不休息、不回家是“家常便饭”。仅2016年上半年，她与全科的同事们基本没有正常休息过一天。因为丈夫工作也忙，两人都顾不上家，她的儿子从四五岁时就经常被撂在家里。这反而培养了孩子的独立性与能力，他从三年级时就学会了骑自行车，自己骑车去上学。宋文采喜欢儿子的独立个性，但心中总不免时常感到有点歉疚。

付出了汗水就有收获，付出的心血必有回报。在宋文采的带领下，呼吸二科整体素质大为增强，业务水平逐渐提高，社会名气也天天叫响。仅支气管纤维镜诊疗，就由原来的每年只有五六十例，发展到目前一个月就达到了全年的水平。科里由原来的“门前冷落车马稀”，发展到现在的患者盈门。住院床位增加到了60多张，常年患者100多位。科里的同事们又用专业术语作了精准的比喻：“宋主任，我们科现在得了‘肺气肿’了呀！”

在宋文采的专业指导下，科里不但在常规治疗上日臻成熟，而且敢于开拓创新，向专业最前沿进行冲刺。“经皮肺活检”进行肺癌“微波消融治疗”，是近些年兴起的治疗新技术，对不能手术治疗的单个肺癌肿，具有较为明显理想的治疗效果，且患者创伤小，痛苦轻，利于恢复。呼吸二科已经成功进行了十几例，在全市处于领先水平。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是一种“老大难”、顽固性常见疾病，而且久治不愈会导致肺心病、糖尿病、高血压等严重后患。近几年，宋文采带领科里采用无创呼吸机治疗此症，并根据病症随时调整设备参数，也收到了明显成效，等



等。2015年，宋文采带领的呼吸二科获得临沂市重点专科；2016年，获得“巾帼建功市直文明岗”光荣称号。在本院，科室连续两年获得“最美劳动团队”奖励。

最让宋文采感到自豪与骄傲的，是她所带领的团队，与广大患者之间建立的密切和谐关系，是广大患者对她们所建立起的高度信任和依从性。其中有一位60多岁的男性患者，曾因严重肺病生命垂危，在她们这里得到过及时有效的抢救和精心护理，给患者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患者出院后一年，不幸又罹患脑出血，在其他医院手术后，发生严重喘憋等症状，只得做了气管切开、插管通气等，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其间，患者突然提出要转到市中医医院宋文采她们科继续治疗，而且态度坚定，十分固执。院方无奈，只得与宋文采联系转院事宜。为了患者，宋文采毫不犹豫地同意接收。患者转到宋文采这里后，得到了后续精心治疗，最后痊愈出院。此后，患者不断推荐、介绍其他病人到宋文采她们科进行诊治。宋文采借此例启发大家：我们只有加倍努力，不断提高，才能对得起社会的希望，患者的信任！这种无形的价值是最可宝贵、最难得到的！

谈到过去，展望未来，宋文采还有一句很朴实、很真诚的话：“我最大的希望，就是不仅我一个人好，而是让所有的医生都好，所有患者都好。”这是一种更上一层的人生与事业境界。为此，她还把满腔希望寄托在更年轻一代甚至一群特殊的孩子们身上。

2006年，宋文采应聘担任了临沂市盲校的兼职教师，主要教孩子们学习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常识。看着面前这些天真可爱、心地清纯的少年们，却遭受着失明的不幸，她心中既充满了喜爱，又充满了无限怜悯。她十分乐意给孩子们当好这个老师，经常拿些衣服和好吃的，接济困难的学生；更希望让他们尽量多掌握一些健康防病知识，再也不要罹患其他什么疾病。她又生怕说得不当或做得不周，给孩子们造成心灵上的不良刺激或挫伤。但毕竟给盲童当老师是一件全新的事情，开始时候难免有些“漏嘴”。在给孩子们讲解各种疾病时，她有时会不自觉地顺口问道：“你们看到过什么没有啊？”话说出来，她立即后悔不已。以后每节课她都小心翼翼，谨慎措辞，比如把“看到什么”改成“知道什么”等。但是，后来她却发现，这些盲孩们的思想根本没有她想象得那样脆弱，孩子们对她说的“看到过什么”之类的话根本不在意，反而会爽朗直率地回答：“我们看不到，但是听说过！”这让她心中备受感动，也深受启发：从小的不幸与艰难，已经把孩子们锻炼得坚强而勇敢，他们虽然看不到世界，但是有一颗充实而无邪的童稚心灵，对生活仍然充满了自信与热爱。相比之下，很多“成熟的大人”，反倒自叹弗如。于是，以后她再也不用小心翼翼地与孩子们对话，还时常对孩子充满爱意地幽默一句：“你们都是刀枪不入的小英雄呀！”逗得孩子们开心地大笑。过年过节时，孩子们都会给他们这位敬爱的阿姨老师送上小风车等小礼物，并用盲文写上祝福的话。她虽然看不懂盲文，但是她会珍藏一生。

2015年，宋文采又担任了滨州医学院临床医疗大四学生的理论授课。她把 these 学生都看作是“未来之星”，为了让学生们学到“实招真经”，每天她都备课到深夜，在课堂上则把自己的知识与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大家，深受同学们爱戴。同年，她参加滨州医学院理论授课比赛，获得了二等奖。

宋文采的心中，也对杏林的未来一代、对那些可爱而坚强的孩子们充满了期待与祝福：

同学们，孩子们，加油，祝你们将来都成为一颗有着闪亮人生与耀眼事业的明星！

省史志办主任刘爱军到临沂检查指导工作。3月27日，省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刘爱军一行到临沂市检查指导工作。市委书记林峰海与刘爱军一行进行了亲切交谈，省史志办市县基层志编纂指导处处长李刚，市政府副市长常红军及市史志办主任刘志强等一起参加了座谈。

林峰海指出，临沂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又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有着全国闻名的沂蒙精神，史志部门要充分利用好这些资源，并与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发展相结合，书写好新时期的沂蒙精神。

刘爱军主任充分肯定临沂史志工作取得的成绩，对林峰海书记等市委市政府领导对史志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刘爱军希望临沂市史志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开拓进取、奋力拼搏，取得更好地成绩。

冀祥德秘书长听取临沂市史志办工作汇报。4月14日上午，市史志办主任刘志强到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中指办）汇报工作。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中指办党组书记、主任冀祥德听取了临沂市史志工作汇报，并做重要讲话。

冀祥德秘书长对临沂市史志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七点要求：一是抓住重点。《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有11项大的任务，其中全国的“两全”目标，山东省的“三全”目标是核心任务，必须完成。二是围绕中心。临沂市史志工作要紧紧围绕临沂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工作，要做好《沂蒙精神志》《大美新临沂》的编纂工作，做到以有为谋有位。三是放大视野。进一步加强与中指办以及全国地方志系统的沟通交流，多到

其他地方志机构学习考察。四是紧跟节奏。当下，在中指办的带领下，有一种节奏叫“方志节奏”，有一种效率叫“方志效率”，临沂市要跟上节奏，加快发展步伐。五是做出特色。《沂蒙精神志》《大美新临沂》的构思非常好，要做出临沂史志的特色，要按照中国志书精品工程的要求，将其打造成精品佳志。六是抓住质量。质量是志鉴的根本，《临沂年鉴》已连续出版23年，要力争进入中国年鉴精品工程。七是创出经验。要打造地方志的“沂蒙精神”，把临沂史志人的担当作为发挥出来、总结出来，形成“临沂经验”。

全市史志工作会议召开。3月28日，全市史志工作会议召开。省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刘爱军、市政府副市长常红军等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传达了市委林峰海书记、市政府张术平市长对全市史志工作的批示，沂水县、兰山区做了典型发言，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刘志强同志对全市2016年度地方史志工作进行了总结回顾，对2017年度全市地方史志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刘志强主任到兰山、罗庄、河东、经济技术开发区、郯城、平邑调研督导第二轮修志工作。3月到4月，市史志办主任刘志强、副主任段洪、唐少清等，先后到兰山、罗庄、河东、经济技术开发区、郯城、平邑调研督导第二轮修志工作。

市史志办到北京市方志馆考察交流。4月11日，市史志办主任刘志强、副主任段洪一行4人到北京市方志馆考察交流。北京市史志办副主任、北京市方志馆馆长侯宏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副调研员刘翔宇等陪同参观了北京市方志馆“时空之眼”北京景观今昔对比专

题展、北京市地情展、阅览室和书库。随后，双方进行了座谈。

市史志办党组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2017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4月18日上午，市史志办党组召开2017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安排部署全办2017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市史志办党组书记、主任刘志强主持会议并讲话，市纪委监委驻一组副组长宋永峰到会指导，市史志办全体人员参加会议。

“沂蒙史志”搜狐公众号开通。4月10日，在搜狐网的邀请下，“沂蒙史志”入驻搜狐公众平台，成为史志系统信息化建设的又一张亮丽名片。“沂蒙史志”搜狐公众号试运行两周内，就得到了5000多的网页阅读量。

市史志办召开《山东抗日根据地志》编写研讨会。4月29日，市史志办召开《山东抗日根据地志》编写研讨会。市史志办主任刘志强出席并主持会议。副主任唐少清、于芹和部分参与编写工作的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临沭年鉴（2017）》组稿方案发布。3月23日，临沭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联合下发《临沭年鉴（2017）》组稿方案，要求相关单位和部门按照年鉴体例，认真撰写稿件，及时上报，确保《临沭年鉴（2017）》顺利编纂出版。

费县方志馆新馆正式开放使用。3月，费县方志馆新馆正式对外开放使用。

《郯城年鉴2017》编纂会议召开。近日，郯城史志办公室召开全县二轮修志暨《郯城年鉴（2017）》编纂会议。全县共140多个乡镇、单位参会。会议部署了2017卷《郯城年鉴》编纂工作。